



# 記憶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10月15日第25期

总第171期

## REMEMBRANCE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71期

## 目 录

### 【专 稿】

徐海亮 社会视野下的武汉初期文革

### 【考 证】

余汝信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三）

——关于杨尚昆“秘密安放窃听器”问题

### 【宇清谈画】

王宇清 那些年，我们是怎么画画的（四）

——膜拜“最新最美”：“现代年画”视野里的中国新文化

### 【述 往】

郭小林 跪戕——张守良之死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九）——上诉平反·后记·补遗

附录一：王孝基：波叔和我们一家

附录二：高忆陵：继父其人

### 【文 摘】

钱理群 关于文革的反思与反省——教育·体制·人性·国民性

### 【读者来信】

1. 杜文：读王复兴《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一文有感
2. 沈爱华谈“宇清谈画”
3. 北京四中退休教师给王复兴先生的信
4. 胡启明、陈小穆、郑道谈 168 期向红专辑

### 【本刊声明】

【专稿】

## 社会视野下的武汉初期文革

徐海亮

本文目录：

- 引言
- 一、社会史角度看武汉文革的“五十天”
- 二、既往社会历史与政治文化在文革中的投影
- 三、造反骨干在现实生活中的疑惑
- 四、早期运动中传统思维及相关社会现象
- 余言

### 引言

武汉地区的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运动，也成为多姿多态的群众性社会运动。运动初底层社会民众积极投入，他们的某些观念一度得到充分表现。近20年来，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当事人——特别是其中曾经扮演过革命造反派角色的一批工人、学生、基层干部，坚持开展口述历史的记录，迄今，已撰写和出版了十来本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为探讨20世纪的武汉社会史，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批素材。据此，本文罗列了武汉运动初期涉及到的某些社会现象问题，诸如：政治身份在群众中的体现、社会分化与造反派崛起、历次政治运动对文革活跃分子心理的作用、群众参与运动的体制因素和分派分层等方面。

### 一、社会史角度看武汉文革的“五十天”

武汉遗留下来的的社会历史问题，最先是在“五十天”对群众的镇压里集中暴露出来。

通常对所谓“五十天”的研究，仅局限于高校的文革“五十天”。实际上所说的“五十天”只是一个政治符号。武汉地区广义的“五十天”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压制、打击，紧接武汉城市“社教”运动，在批判“三家村”阶段业已突出显现；而武汉群众对其极“左”政治文化的质疑、受压制群体的奋起反抗，在10月批判“资反路线”之后，才渐入高潮。反映出“五十天”社会学意义的样本——官僚化体制与民众的根本对立：深化政治身份，转移运动方向——打压、镇压普通群众和市民，在工矿企业、机关团体和街道普遍出现。

武汉重型机床厂1966年4、5月在厂工人文学创作组抓“三家村”，李向阳<sup>1</sup>回忆，当时他和朱洪霞等指责“工会和党总支执行了错误的文艺路线和阶级路线，……这样就被当权派打成‘三家村’……”刘传福回忆<sup>2</sup>：“我们也没想到我们文学创作组，也派来了党委工作组。……突然有一天，他们说李向阳的一首诗是反动作品，是反革命作品……批‘三家村’，说李向阳是主帅，……我也成了‘三家村’的，是先锋，朱洪霞是第二个跳出来的，<sup>3</sup>他成了大将。”管理大字报的祝孝先<sup>4</sup>不认为一张大字报是毒草，自己就受到围攻。在文革运动初，该厂组织了工人“红卫兵”破四旧、抄家和批斗反革命，全厂非正常死亡5个人，包括高级工程师朱文鑫。横扫职工导致群众分裂成两派，形成最初的少数派，催生了造反组织的骨干，工人诗人朱洪霞走上社会运动，则成为武汉“工人总部”<sup>5</sup>的一号头头。

武汉锅炉厂的文革运动也紧接“四清”运动开展。王光照当时是“四清”骨干，他回忆开始冲击的是：厂副总机械动力师刘文斌，据说系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问题；王荣昌，60年代毕业分配来厂工作的技术员，刘银珠，1960年分配来厂的技术员，据说是家庭成分的事。工人谭文元，因为家庭问题，工作队要他交待反动言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他慑

<sup>1</sup> 李向阳，高等职业学校毕业分配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做技术员，共青团员；在该厂党委宣传部工作，主动要求到车间体验生活。李向阳和朱洪霞、刘传福后来成为该厂造反组织的领头人。背景材料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11页，银河出版社，2005年。

<sup>2</sup> 刘传福，武重工人，该厂造反派领头人物之一，曾任工人总部宣传部长。2007年12月11日访谈记录。

<sup>3</sup> 朱洪霞，技校毕业的年轻工人，武重厂文学创作组组员，后任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1968年被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判刑15年。

<sup>4</sup> 祝孝先，工人技术检查员，1958年为选举出的工会主席，“四清”时任工人协会主席，1966年入党。武重造反派组织领头人物之一，1967年10月任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总指挥长，1968年任该厂革委会副主任。2003年访问。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19页，银河出版社，2005年。

<sup>5</sup> 工人总部，全称“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为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

于压力上吊自杀。另一位老工人，上海援建来汉的，也是工作队找他交待历史问题和所谓攻击“三面红旗”言行，上吊自杀。王本人对这些做法看不惯，就被排挤出依靠骨干了。后来，清华大年分配来厂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沈复礼也成为打击对象。1966年9月，沈不赞成省、市委大抓“南下一小撮”，被大字报批判，全厂贴出巨幅标语：“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沈复礼！”<sup>1</sup>

武汉钢铁公司综合经营厂运动积极分子黄连生，“将自己在‘四清’运动中了解到的本车间工人、33岁的二级钳工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过的内幕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庞……撕掉了那张揭发自己身世的大字报，并且与黄连生发生了争吵。庞……捡起一块砖头去打黄连生，不想打在一位前来劝架的积极分子女工蔡先梅头上。这本来是一起不大的群众纠纷，中共湖北省委却认定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引起许多群众不满，第一技校的学生全部上街，表示不服。<sup>2</sup>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干部曹承义，其父亲原为开小杂货店的，运动初被打成资本家，戴高帽挂黑牌批斗；曹是“四清”的骨干，但不满足于打压群众，也被内控为“漏网右派”。

泛政治化搞运动的例子，在工商业城市的武汉屡见不鲜。武钢修建部干部彭绍鹏回忆：揪出了“三家村”在武钢的黑线人物党委宣传部部长常志、“武钢工人报”社长陈曙等人。工人“红卫兵”成立以后，立即抄了他们的家，举办了展览，又把一个技术员段彦彬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彭只因在发言中称段为“同志”，工作队再也不让彭发言了。中学和工人“红卫兵”押着头戴高帽、胸挂木牌的五类分子、资本家、反动权威等“罪人”的队伍游行。小饭铺的老板，在烈日暴晒下，活活被斗死在大马路上，尸首抛在铁路边无人敢收。

<sup>1</sup> 王光照，武汉锅炉厂工人，工总武锅兵团勤务组成员、厂革委会成员，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干部队伍和厂籍，留厂察看。引文见王光照：《这里那里 潮起潮落》，11-13页，中国文化传播，2013。

沈复礼，党员，技术骨干，曾为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文革后被关押6年，后免于刑事处分，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sup>2</sup> 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7-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曹承义，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员，新一冶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判刑5年。

罗工程师被批斗、抄家，卧轨自杀，死后还被扎稻草人批斗。<sup>1</sup>武钢机务段的火车司机陈祖坤（后为运输部革委会常委），被诬为“鱼霸的孝子贤孙”，打成“现行反革命”。<sup>2</sup>无独有偶，武昌铸钢厂工人胡厚民，党员，本是船工家庭出身，造反受到镇压，一再被当局宣传他是渔霸家庭出身。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利电力部下属的派出单位）在6月先后把副总周尚，宣传部副部长陈亮，留苏工程师陈济生，干部科汪镇国，勘测处副总李元亮，政工科长冯志运，计划处冯明清等当作对象抛出来。7月批判所谓反动文人、阶级异己分子分子田海燕。8月把勘测处夏施霖，政工科长冯志赢，副总李元亮，技术员胡启裕、黄长青分别挂上“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漏划资本家”的黑牌，戴上高帽子游斗。<sup>3</sup>

武昌铸钢厂工人胡厚民被派到北京学技术，回到厂里，胡厚民和李承弘、喻尊启三人成立了“红尖刀战斗小组”，写大字报质问是谁“扼杀了我厂第一个工人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谴责市冶金公司对运动领导不力，不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遭到有组织的反击，有大字报说厂长吴方贤、喻尊启（厂党支部组织委员、工人工程师）和胡厚民三人关系密切，指责他们是“三家村”拉帮结派，不搞政治挂帅，搞“唯生产力论”。<sup>4</sup>

交通厅科长付廉参加本系统的“四清”，后转入文革，他反思前一段运动，认为与毛主席说的相信群众的政策不符，有些完全是捕风捉影，按照文件精神是工作队错了。结果省长张体学亲自打电话骂道：“咯狗日的快来”，去后他劈头就说：“你还反了，叫工作组撤？！”并要付写检讨。张通知交通厅：付没有资格当工作队员，要把他遣送回去，付廉回到武汉，就有大字报说要“打倒走资派付廉”。<sup>5</sup>因不同意工作队做法，他自己反而

<sup>1</sup> 彭绍鹏：《时代与人生》，38-40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sup>2</sup> 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sup>3</sup> 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党员，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判刑7年。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8-29页，银河出版社，2014。

<sup>4</sup>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百年政治命运》，147页，中国文化传播，2010年。

<sup>5</sup> 付廉，交通厅航运管理局科长，党员，后参加造反，成为省“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厅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委员，文革后被判刑4年；2003年访谈。

成了斗争对象。

在武汉的政治气候下，大型国营企业和水利部属单位、省直机关工作队和党委掌握运动的水平尚且如此，中小厂矿企业和区办企业、街道小集体的运动，可想而知。

武汉制药厂厂医孙康，厂里要他把祖传秘方贡献出来，他不同意，却被打成“孝子贤孙”、“反动学术权威”。青年邢贵均搞点技术革新，被打成破坏生产的坏分子，到处游斗。该厂从事职教的丁元芳觉得这些与“十六条”精神对不上，写了大字报，炮轰厂党委，厂里就开了锅，要抓他们黑手。<sup>1</sup>

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吴焱金，其母亲金金玉是居委会妇联主任（老工人），得罪了一些人，居委会有干部纠集中学红卫兵，将其母亲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子游行。吴联想到工作队指导下的运动，在厂工作队召开的会议上，提出这种搞法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遭到工作队的排斥，以后开会就不再通知他去参加了，吴焱金从而走上造反的道路。<sup>2</sup>城市社教和“四清”运动早已深入到街道基层，前几年运动已在四分之一的街道和居民中开展，发展党员，健全支部，1967年出现老少尽知的街道“红城公社”，老爹爹、老太婆参加文革的街头运动决非偶然。文革扩展到批斗基层居民、居委会的负责人，也是武汉极荒唐事情。

北大学生涂仰豪母亲为汉正街地区的居委会主任（老工人）被涂的堂兄涂仰英（原戏剧用品厂厂长）带队抄家批斗，因涂参加南下学生炮轰省委，被保省委的南下中学生点名，斥为“孝子贤孙”。前进一巷居委主任王霞君被批斗（王系汉剧艺术家胡桂林夫人，胡自杀）。居委会曾经是前“四清”运动的一个重点，发生在街道基层的事件远不止这三起。暴力涉及到居委会，不仅早期“50天”触及和伤害到基层居民委员会，反面的例子也有，如保守派的章迪杰批评造反派反弹时大肆批斗当权派和“保皇派”，“连居委会的老太婆

<sup>1</sup> 摘自2003年丁元芳访谈记录。

<sup>2</sup> 吴焱金，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技术员，工造总司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判刑8年。引文见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4-5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

也不能幸免”<sup>1</sup>。

8月22日，湖北省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坚决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当天，武汉市委常委会传达省委领导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贯彻《十六条》不能怕乱，要准备乱它一、两个月。”在省市研究决定和布置下，23日湖北省委在洪山大礼堂召开了武汉地区红卫兵代表会。1800多名武汉地区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佩戴着鲜红的袖章，穿着当年父辈打江山的军装”（8月24日《武汉晚报》报道），参加了会议。省委张体学、李衍授到会讲话，许道琦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省委、省人委负责人王树成、韩宁夫、史子荣、陈扶生等。他们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省委动员的当日，即掀起全市全社会大破四旧大批大斗的高潮。

曾任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汉阳分部总指挥的李江认为：“至今，人们一说到北京以外红卫兵‘破四旧’的起因，往往归于8月22日新华社发布的首都红卫兵‘破四旧’的消息和23日《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事实上，并非完全这样，至少我所经历的不是这样的。记得8月23日那天，我们武汉地区红卫兵‘破四旧’是兵分三路进行的，一路是武昌，以武昌实验中学为主体；一路是汉口，主力军是武汉市一中；一路是汉阳，由武汉市三中、墨水湖中学等校联手。我当时是武汉三中红卫兵，参加的是汉阳这一路，上街‘破四旧’前，我是没能读到这两篇文章的。”“在我们‘破四旧’那天召开的红卫兵代表会议上，不仅省委领导对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造反行动表示了支持，而且来自武钢、一冶的工人代表，以及农民代表、省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饶兴礼等，都表达了对红卫兵的最坚决和全力的支持。在这次会议的前后，我记得张体学、宋侃夫等省市领导，还分别到各大中学校，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行动。”<sup>2</sup>

记载：“与武汉地区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同步，在长航公司的带动下迅速在全市漫

<sup>1</sup> 章迪杰，峥嵘岁月，14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章系硚口区房管所基层干部，曾为“百万雄师”常委，联络部长。

<sup>2</sup> 李江，系市第三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2015年5月采访记录，摘自《武汉地区红卫兵‘破四旧’》调查稿，2015年。

延，并开始查抄地、富、反、坏、右和所谓资产阶级分子及‘学术权威’的家，随后又把查抄的对象扩展到工商业者、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文化艺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最后直指党政机关负责人。”<sup>1</sup>长航职工沙云乐回忆：“1966年8月23日，长航党委书记贺崇升、政治部主任李震宇为首的当权派，发动了一个揪斗牛鬼蛇神运动，把长航系统内部揪出了32个人（编者注：官方的记载为104人），带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游街，在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游了一圈。武汉搞游斗牛鬼蛇神就是长航带头搞起来的，对湖北的影响很大。”时间顺序看，武汉市“红卫兵运动”高潮，完全是省市委同意部署、发动推开的。

当年参加运动的中学红卫兵回忆：“从8月23日清晨开始，武汉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破四旧’，由砸招牌开始，到更改路名，最后发展到拉人游街。当时只要是被单位或街道认为有问题的人，学生都可以拉他们出去游街。这些人，头发被剪，头皮或露或不露，走在大街上，往往引来人们一阵哄笑，笑他们是‘癞皮狗’；有的还挂着牌子，甚至双手反剪，一律低着头，光着脚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行走。很快地，这股风就吹到各个中学来了，自然也吹到武汉二十八中来了……初三（3）班的一群学生拎着一个女老师的四肢，吆喝着把她抬进本班教室。我问那些学弟学妹，这个女的怎么了。学弟妹们气呼呼地七嘴八舌：‘看样子，她是昏过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我看，她那是装死！’‘等她醒了，再游！’高二（2）班的学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洁的彭老师推出来，按着跪下，还把一个又破又脏的字纸篓扣在他头上。彭老师不声不响，高举双手做投降的样子。有几个本班和外班的学生冲上去就是一顿老拳，打头打背打胸脯。彭老师躲避不了，只能发出哼哼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班同学们到齐了。8点钟左右，同学郑某把正在劳动的舒先生叫来向他宣布：鉴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高二（一）班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把他拉到社会上进行批判。舒先生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看了看周围面若冰霜的学生，一言未发，就低下了头。有人拿来一个字纸篓扣在舒先生头上，又用一根麻绳系住

<sup>1</sup> 《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1978）》，501—50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字纸篓，接着把绳子两头交叉从面部到耳下绕到脑后，系了一个结，又绕到脖子前面，打了个结，绳子多余部分由押解的人牵着。队伍出了校门，4个同学拿着木棒分走两旁。一路上，同学张某领喊口号，同学们尽力跟着喊，行人或看或跟着走，有人还询问游街的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还有个别人冲进队伍里给舒先生一巴掌。押解的人有时制止，有时又没制止。”<sup>1</sup>

但青年学生普遍反对文革运动变成横扫知识分子和群众。杨道远<sup>2</sup>是武汉测绘学院学生，运动初，“整个学校都在整学生，整老师，青年教师仇爱立被打成反革命，从一号楼跳下自杀了；一对老教师（葆康夫妇）被说成是国民党中校，也被逼双双自杀了。还有一级教授叶雪安、讲师洪克艺、讲师梅其祥都被整死了。我认为这做法是不对的，就去找工作组，反映自己的看法。我说，你们这样搞，仅仅能整群众，整学生干部，但如果要搞好文化革命运动，是不可能的。”华中工学院学生冯天艾，父亲当时在建工局工作，被打成建工局的“三家村”，游斗、抄家；7、8月学校里盛行“血统论”整“孝子贤孙”，大字报就点了冯的名。

与全社会大规模横扫群众“牛鬼蛇神”同时，学校里“历史问题论”、“血统论”盛行，迫使一大批忧国忧民的大中学师生不堪压制，走上批判资反路线、革命造反的道路。文革前几年，王任重就在文教系统做报告说省内教师队伍“地、富、反、坏、右、军、警、伪、宪、特、僧、道、巫、尼、娼”成堆<sup>3</sup>，文革起来，在教师中大抓反革命，是普遍的实情。

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被省委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武大成为湖北的运动样板。官方划出27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握91人；武大党委常委13人，有9人被斥为“黑帮”。在1222名武大教职员工里，有227名被公开划为“黑

<sup>1</sup> 原武汉市28中学生刘中秋回忆，摘自《武汉地区红卫兵‘破四旧’》调查稿，2015年。

<sup>2</sup> 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党员，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二司勤务员，后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两次被判刑13、15年。引言参阅杨的回忆，奉献，2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

<sup>3</sup> 夏家保：《蝉鸣录——八十回眸》，249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夏文革中系汉阳三中教师，引言系夏在武汉师范学院上学时，院教务处长蹲点传达所言。

帮分子”。同时一批普通学生也被划了左中右。建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达不幸身亡。

7月6日，在省常委会讨论运动形势时，王任重书记指示：“作为右派分子斗争打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学生中搞百分之一。武汉市大专学院五万人，合起来才百分之一点四，也许百分之二。中学生一般的不划右派，毕业班特别突出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当右派打。干部、大学中要反右派。……相当于高中的按高中办，高中三年级，少数特别反动的要反右派，其他的是反革命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办，是流氓按流氓处理，该逮捕的逮捕，该开除的开除。工人里一般的不搞反右，是反革命按反革命办，是贪污盗窃按贪污盗窃办，还有一种坏分子……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是什么按什么处理。各学校、机关把左派组织起来，注意保卫工作，注意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行凶杀人，负责监视的要拿着棍子。……你要拿刀杀，我就要打，纠察队要拿上棍子，反革命分子要我们交枪，就把他抓起来，有的人叛变了，叛变投敌要开除党籍。”<sup>1</sup>武汉从机关、学校到厂矿、街道都按这样的精神，对群众展开了所谓“横扫牛鬼蛇神”的严酷斗争，对象早已超出传统概念中的所谓的阶级敌人。

1966年5-7月，武汉全市以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批准逮捕大中学生和工人400多人，在全国大城市中居于显赫位置。到8、9月，在社会上以“破四旧”名义，揪斗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统战对象、普通群众或有历史问题的人、五类分子，抄家游街，官方统计全市有32人被杀害，62人自杀。人为制造了所谓的“红色恐怖”，改变运动方向。

武汉市从清末民初以来，就是一个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工商业城市，半封建半殖民性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与上层建筑，有广泛的遗存的人与事。既往的人事、世俗关系，历史事件、政治与社会斗争、传统与习俗都投射、交织与积淀在这个平台上。按王绍光查阅地方史志与政法档案的记载：1949年武汉解放时，有2.2万名国民党正规部队官兵、3.2万名杂牌军官兵、0.62万名国民党员警起义，1万名旧党政人员留用下来。后有十几个反

<sup>1</sup>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32页，银河出版社，2005年。

动道会门黑社会组织被清洗改造。在1951-54年工业企业民主改革中，有3%的工人（8千到1万人）被划为“反动封建残余势力”斗争……全市有5%的人被视为敌对阶级分子。1950-53年镇反中，有几千人被判刑。为稳定与巩固人民新政权，扫荡残渣余孽，多数人也十分认同，对于生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他们更无可厚非。此外，在1951年“忠诚老实”运动中有2464名干部被发现有问题，1955-56年肃反运动中有6652名干部被划为反革命和坏分子；反右运动把6261人划为右派，945名工人、职员和警察划为坏分子，1928人划为中右。1959-60年反右倾中，有1784名干部被开除出党，1139名干部受到批判。社教运动里，6.35%的党员被开除。1949-65年有8437人被划为“反革命”监禁。<sup>1</sup>按此不完全的统计，解放以来，约占武汉市城区5%以上的人，受到过各种运动的冲击，被批判斗争、监禁判刑。国民党和三青团成员、前资本家、民主人士、历次被清洗的共产党党政人员、一般工商业者、小业主、商贩、前自由职业者、与旧政权有过接触或合作者、前封建把头和工头、前宗教神职人士，以及前妓女舞女、市井流氓、坏分子、劳教劳改释放者、信教者等等，均按传统阶级斗争的认识视为有问题的人，加上他们的直系亲属、亲友、同学受到牵连，这一比例就相当大了，都是政治身份较为低下的人。在1963-65年，压缩小商贩和城市人口，把部分“四清”中发现有经济问题的，以及小商贩、地富老人遣送下乡，涉及面日益扩展。到了文革初期，当局和各级领导、运动骨干，把上述人员和关联者作为运动理所当然的怀疑、斗争对象，排队、监控。沿用对敌斗争、党内斗争“剥笋”的思路，维护固有的身份，针对运动中不同的意见，把普通的工人、干部和学生、市民也扩展为打击对象，剥夺其颇为纯正的政治身份，制造新的敌对分子。运动初的省市市委、支左时的武汉军区、革委会时期的军政官员，无不草木皆兵，制造阶级斗争。造反骨干绝大多数生长红旗旗下，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也肯定以往的运动的，相信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真诚参加文化革命，他们也难以摆脱成为新“反革命右派”的命运。文革究竟是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革命对象，还是针对人民群众，祭起“社会关系”来压制人民民主，

<sup>1</sup> 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50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甚至把革命群众一再打成“反革命”？这是引起广大群众最为疑惑、不满的问题，也是把一批正直向上的青年逼上梁山的原因。

1967年7月，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领导讨论局势，涉及二司学生坚决抵制部队镇压工人总部，牛怀龙师长就提出是否前一年抄家涉及到一些中学生家长引起反弹？<sup>1</sup> 部队官员实际上设想到这种可能：早期运动打击各阶层群众，引起复杂的社会心态反弹。这是一个值得考证的，值得讨论的政治学-社会学问题。保守派的“百万雄师”的联络部长章迪杰，在回忆录中也客观地承认：“长期以来，各级领导在宁左勿右思想指导下，在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运动中，难免搞扩大化，错整错划一部分人，这种做法在文革中被称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便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要求改正自己的冤屈，并且要把关于自己的‘黑材料’从档案中清除掉。这些人由于受压抑太久，反抗的力量特别大，难免有过激行为。”<sup>2</sup>

在1966年夏天，按照湖北省委“左”的思维方式主导的文革运动，触及政治身份问题，揭开社会下层和“问题阶层”日久不愈创伤，撼动了武汉上下，造成了族群的撕裂。从运动初的“五十天”，到1967年春镇反，到1969-1972年打击所谓“北决扬”、“清队”“一打三反”、“516分子”，到文革结束后清查“三种人”，文革全过程主要打击、清算最重的一直是一批造反骨干，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梦魇始终萦绕着他们。最初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造反头头，经历了十年的来回折腾，最后仍然是确凿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主导的文革路线被当局宣布“彻底否定”——官僚传统整治民众的异型文革获得了彻底胜利。

## 二、既往社会历史与政治文化在文革中的投影

种种不正常现象，人们逐渐发现只是既往政治运动形成的某种政治文化的积淀——惯性再现而已，这种文化浸淫的不仅是官员及其依赖的骨干，也波及与侵染到体制内外的

<sup>1</sup> 1967年9月8201部队师机关整训办公室整理揭发材料。

<sup>2</sup> 章迪杰：《峥嵘岁月》，1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所有群众。当时惯用“左”的“阶级分析”来探究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直接冲击部分群体现实生活，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文革中以封建“血统论”形式显现。

李承弘父亲是武昌首义的英雄、民国元老，湖北省民革的领导人物之一，解放后任省商业厅副厅长、政协副主席；土改复查，家庭成分从贫农改为下中农，家里人不服，“人为何要分三六九等呢？”李家交往多为上层和统战人士，到1950年代末，其父亲彻底被边缘化，也不作省民革主委了。其长兄与胡风分子有染，57年划为右派。家庭终于由荣至衰，都留下无法消弭的阴影。与李同在文学创作组活动的李子元，与不少反革命和右派同事都熟悉，谈起1956年汉阳一中事件还心存余悸<sup>1</sup>。

三中学生谢保安，其父亲也曾参加革命，后脱党，又集体参加国民党，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反蒋、掩护共产党员，成为统战人士，曾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对一些政策之“左”有保留，其一些好友在党内斗争中落败下台；而其长子也不幸打成右派。这些在谢的心理也造成影响，涉此有尴尬、同情之感。据云：其“小伙伴朱力的父亲当时是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结果在改正通知书下达的前几天自杀了。所以从小愤恨那些极‘左’，痛恨滥用优势地位，欺负弱者。”在红八月“每听到喊一些极左口号，看见一些出身不好的被罚跪、抽打，我就觉得心里剧痛，好象就是冲着我来的。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连唱‘东方红’的资格都没有。”起义将领陈克非，与谢父熟悉，曾任省政协常委，但66年夏，“陈将军不堪凌辱，携妻子儿女在武昌大堤口跳江弃世，陈将军是以双臂挟着一双幼儿幼女跳江的。其情十分惨烈。父亲晚年每念及此，几近哽咽，不能自己。”<sup>2</sup>

前述曹承义运动初父亲被批斗，影响了曹的身份，从而他被领导列入另册。武汉是一个开埠很早的商业城市，小业主、小商小贩很普遍，产业工人外的其他阶级、阶层社会影响较为广泛，社教和文革运动初，对资本家乃至小资产者的冲击扩大到这一部分不红不黑

<sup>1</sup> 李承弘，武昌铸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曾任工人总部组织部长，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厂籍，留厂察看。参阅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百年政治命运》，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2007年王芳访谈，见王芳硕士论文《记忆中的底层文革》（2008）。

<sup>2</sup> 谢保安，三中学生，二司勤务组成员；文革结束后曾被关押审查数年。2003、2005、2016年访谈。

者（俗称“灰五类”）和他们的子弟，许多年轻人受到不应该有的政治影响或歧视。机械学院学生刘汉武，父亲在海外，被长江航运公司的“红卫兵”抄家，说他母亲是逃亡地主婆，并画了一张漫画来丑化她。机械学院选举文革小组，老师方斌（原名方振民）参加选举，“这个老师比较正派，我们很支持他，方父是铁路工人，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伪保长，因此当权派就揪住不放；而且还说方家弟兄的名字里面有反革命含义，方家的四弟兄的名字分别是方振中、方振华、方振民和方振国，合起来就是要振兴中华民国。”<sup>1</sup> 因此，学生就分成两派辩论出身与革命权利的问题。

张一帆父亲大学毕业投身革命，以地下党组织、游击队身份迎接解放，但地下党干部不受重用，产生思想疑惑。有人“捏造了一个理由说父亲在国统区出卖了同志，还串通了一个人来揭发父亲。这样就抄家……把父亲关到武昌监狱11个月，内查外调什么问题都没有。放出来之后副总也没有了，降为处长。”“1957年反右的时候，父亲说某些干部的品质确实有问题，应该作出检查，结果被划成右派。”<sup>2</sup>

杨道远回忆在运动中，军区文工团的“原右派分子白桦写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诗歌，登在小报上，我说他支持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是右……武汉机械学院总部曾经为老红军刘德胜的右派帽子翻案”，为支持省公安厅的三结合，机械学院与水利学院造反学生刘某李某在省革委会开证明去广州，为老干部纠正错案，“这样就记了我的账，说我和右派搞到一起，并充当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保护伞等等……武汉的一些归国华侨参加了运动，成立了造反组织——红侨兵。这个组织的勤务员叫吴涂塔，是个从日本回来的华侨。1967年二月逆流时被抓进了监狱，罪名是“日本特务”……有人为吴涂塔翻案，理由：他是特务早些时候为什么不抓？他参加了造反派你才抓他的，抓他不是抓特务，而是镇压造反派。……就这样当权派把我说成是地富反坏右、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总保护伞，学习班把我定成刘少奇与牛鬼蛇神联系的中间人：上联刘——下联牛。”<sup>3</sup>

<sup>1</sup> 刘汉武系武汉机械学院学生，该院革命委员会委员，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员。2003年访谈。

<sup>2</sup> 张一帆，区民政局办福利工厂工人造反派，2003年访谈。

<sup>3</sup> 杨道远：《奉献》，13页，282页。

上述已涉及了一些反右在文革参加者心理的阴影问题。武汉液压件厂平毅，曾由部队送到清华大学读书四年，又回到部队和工厂，经历是相当单纯和正面的，但他也回忆道：9个小学老师，8个是右派……当时在部队也经过反右倾运动过来的，看到这些，就自小对政治不感兴趣，觉得很危险……当时主要的感觉就是运动多，而且整人很厉害，所以对政治怀有戒心，所以宁愿搞技术吃饭，尊重科学。<sup>1</sup>付廉则在“四清”运动受到揭批：“揭发和批判我的主要问题是与右派打得火热，另外就是批判我革命意志衰退信奉活命哲学。因为我姐姐的儿子1957年在南昌学校里被打成右派，另外我的表兄在黄陂文化局也被划成右派，我跟他们有些来往。”所以，1957年反右打造的利剑，高悬在每一个投身文革的人头上。而文革的活跃分子，实际上造了“左”的体制的反，都要过一关，即自己的言行是否反党，自己是否右派分子？如何认识1957年反右？连根红苗正的杨道远也必须面对，乃至受到体制的攻击。

武汉水院的张建成，回忆起在北京电院工作时，“在被划为中右的人员中，挑了三人上报，我科的热工老师是其中之一，被定为漏划右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记得很清楚，宣布他为右派时，他刚讲完课回教研室，手上都是粉笔灰，当听到他被定为右派后，顿时晕倒在地、口吐白沫……这位老师以后调保定钢厂工作。听说在文革中不堪受辱，跳入炼钢炉自尽了。……我校的人事科张科长，是小八路出身，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对校长的干部政策提出意见，说校长往往对人不对事，对印象好的人与印象不好的人政策不一样……就因为这条意见，最后被定为右派。”<sup>2</sup>对反右的印象和颇富人情味的看法，促使初期身为院运动领导小组成员的张，反而站到了同情学生、反对镇压学生的造反行列中。

多数文革运动的带头分子在心理上首先都需要通过“57年反右”和“什么是党的领导”这一关。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反右恐惧，右派妖魔化的舆论于他们仍有深重的心理负担，他们先要从自己身边开始，反省“反右”的后果，认识扩大化的政治运动扭曲了党群关系

<sup>1</sup> 平毅，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曾任省总工会副主任，2003年访谈记录。

<sup>2</sup> 张建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引文见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54-55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

和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了说假话风气，促使了社会分化，产生人的政治身份差别，还需要自己与融汇入血液的极“左”分道，才能在现实运动中，抵制对普通群众的“横扫”，抵制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他们一次又一次公开反对极“左”，一次又一次主持公道和正义，为被镇压者鸣冤叫屈，进行平反。他们没有引颈就戮，而是一次次奋起抗争。这当然是相对于1957年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的一种思想解放，有一种“公平、正义、民主”的天生诉求。

不过，特定的“左”的政治文化，由其派生出的社会行为，不是通过中央号召的批判资反路线就可以解决和摒弃的。从57年反右运动形成的整人文化与对敌斗争的不断扩大，妄说假话，在党政体系中有其深厚的组织与思想基础，形成一种政治文化，从各级领导干部到基层领导、群众，都深受其影响与危害。乃至反抗这种文化的造反者本人，在一定时候也会复制并重复这种文化，用来对付与自己认识不同的群众和干部，其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意义极为深远……

工人与干部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如何看？这是在1960年代十分被人们注目的另一个问题。李承弘回忆，在“四清”运动时要人人过关，讲三年困难时的言行，传播了什么三反言论。他承认自己天然相信一些右派言论（如长兄的朋友周某，还是学生运动入党的——说过：现在的言论还不如国民党时期自由），在车间大会上主动讲了。尽管是作为自我检查谈的。而职工中一些明显的地富反坏右被调离了。<sup>1</sup>湖北省在大跃进时是紧跟浮夸风的。平毅在当学徒时，1958年搞检查，“看到地方干部说假话做假事，印象很不好。我父亲是当地的种田能手，算是会种田的，但是对哪个亩产动不动就是千斤万斤的产量，简直是不可思议。结果我们都亲眼看到了当地干部制造高产田的过程。”显然对浮夸有看法的。王光照在“四清”做检查说1959年冬天，“去武昌县五里界人民公社参观。同学们与我看到农民家里簸箕里推着半干不湿的树皮，筛子里装着细糠。问派什么用，社员面有怨色地答：能有什么用？粮食不够吃，掺着填肚皮……回校讨论时，丰收论占上风。我根据自身在农

<sup>1</sup> 李承弘：《百年寻梦》，13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村生活的经验，说大概没有这么丰收的吧。就这一句很有保留的发言，让我入团的时间延期一年。怎么也想不到居然塞进了人事档案。更叫人生气的是什么‘收听敌台广播’……”。

<sup>1</sup> 其他厂矿企业也和锅炉厂的“四清”运动一样，要清理职工在困难时期的对形势的模糊认识。

原来在孝感地委的魏绳武<sup>2</sup>回忆道：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间，湖北的浮夸风完全是王任重一手搞起来的。大概是五六月份的时候，王任重从襄樊打电话到孝感，说我们在襄樊发现了历来低产的小麦，现在亩产3215斤，你们向来高产的水稻，应该产几多……不久王任重就亲自到孝感来了，当时商业部也派人在孝感挂职，他们讨论孝感的规划，要搞水稻“千斤县”，那么千斤县里必有几千斤的公社，几千斤公社里必有万斤田。

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说要到孝感来视察。他们就提前几天搞各种非常过分的举措，结果主席来后没有下车，他们的准备都白费了。当时计划要毛主席去长风公社视察，表面工作做到什么程度呢？从火车站到长风公社十华里，修路是当然的，路边还要搞成山清水秀，把全地区的明矾搞来，放到路边的池塘里去，把水澄清；然后把红糖化在田里，黑黢黢的冒充肥水。省里派了几百人，把卖麻糖的小贩都赶走，由他们在那里冒充。

他按照自己独立思考的认识，1959年下乡蹲点写了一些情况，“刊发在〈孝感通讯〉这个内部刊物上，都是反映食堂、产量和民情的实际情况的……回来之后，看见会议室大字报都贴满了，说我与彭德怀遥相呼应。”<sup>3</sup>

这些坚持说真话的基层小干部和工人自然成为被体制边缘化的人，后成了造反派的骨干。他们抵制假话，坚持说真话，对说假话搞浮夸的不满在60年代初已经埋下来了。

武汉的城市社教和“四清”，照当时省市党政领导同志和各级运动骨干的理解，这次运动对象，实际上是普通党员干部、文化界干部、职工和居民的下层群众，困难时期群众

<sup>1</sup> 2005年访谈。

<sup>2</sup> 魏绳武，武汉市农委副科长，党员，市机关红司一号勤务员，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被审查“516”问题关押多年后无罪释放，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被开除党籍。有“机关”等回忆著述。

<sup>3</sup> 2004年访谈，另参阅魏绳武回忆稿，机关，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

中的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行为，成为运动的重点。

锅炉厂的“四清”运动也伤害到一批普通职工，王光照回忆：三〇一、三〇三车间硬是抓出了一个“王竹定反革命集团”，它的成员都是从上海锅炉厂来援建武锅的老师傅。……他们平时来往紧密，怪话、牢骚也不少，对三面红旗说三道四。在全厂批斗时，不外乎就是这些事……供应科也抓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李振东，只因与别人同名；管生产供应的副厂长芦培智的党籍问题，工程师张以仁，被上纲上线，在全科几百人的大小会上被批判了两个月，此外就是一些有所谓海外关系的技术干部……<sup>1</sup>

许多造反骨干正值三十岁上下，都参加了这一次运动，不少人当时都还是运动的积极分子。李承弘回忆造船厂的“四清”运动，要人人过关，讲三年困难时的错误言行，对下面工人主要是审核家庭出身。<sup>2</sup>付廉在“四清”中被揭批了几个月。解脱后分配到县交通局汽车保养厂的工作组，保养厂一共300多人，工作队员就有42人，完全是人海战术，说整个保养厂都烂掉了，厂长是国民党，书记是阶级异己份子，车间里地痞流氓成堆！书记早就提了干当车间主任，因曾在小老板处当学徒，有人检举说他是资本家的儿子，把他称为阶级异己分子。车间有几个年轻人，技术方面比较行，就有些淘气，但根本不是什么地痞流氓。<sup>3</sup>

武重的李向阳回忆<sup>4</sup>：武重的“四清”工作组长是市委组织部部长辛甫。当时就是把所有的干部都拉下水，再一个个提起来；在工人中间就组织工人协会，也是按照工作组划分的门类出身等，分三批逐步加入工人协会。我当时是团员，按照毛主席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指示，说这个做法是不对头的，是打击一大片。辛甫就点了我的名，在团支部大会上进行批判，说我反对“四清”运动……从此我就被打入另册。

武钢的火车司机陈祖坤，在“四清”运动中交待的是：三年灾害中，汉阳有位叔伯的

<sup>1</sup> 王光照：《这里那里 潮起潮落》，2-4页。

<sup>2</sup> 李承弘：《百年寻梦》，131页。

<sup>3</sup> 2003年访谈。

<sup>4</sup> 2003年访谈。

舅舅找我帮他搞点铁丝在乡里做房子用。我利用机车洗检的机会到仓库领了5公斤铁丝拿回家。““四清””时期，我经过痛苦的斗争，主动写出交待材料，承认了错误，并在机务段的““四清”会”上作了发言。<sup>1</sup>

武汉许多工厂企业的五反与“四清”，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普通工人中打击小偷小摸，投机倒把，集中在三年困难时期。清查出来或本人交待的问题，包括对于三面红旗和形势有什么错误认识，到文革运动中均成为批判打击群众的钢鞭材料。

吴焱金在市革委会开正、副主任碰头会，其中讨论对陈长根的死刑判决（陈长根曾主动交待的困难时期盗卖过8000双劳保手套，1971年被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判死刑，执行枪决）。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均坚决不同意判死刑，没有抵制成，当时发生严重烧伤有人要植皮，所以急急忙忙“枪毙”陈长根，实际上陈长根是被活活剥皮的。<sup>2</sup>

1957到66年的这些涉及普通群众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构成了武汉的部分前文革社会史，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发展到“五十天”的政治镇压，不是偶然的。所以武汉造反学生、工人群众认为，这个“五十天”文革前就存在了。

### 三、造反骨干在现实生活中的疑惑

在平民出身的造反派骨干回忆里，集中了他们对文革之前整群众的运动偏向，和僵化的政治文化日渐反感，如果说在过去，他们仅仅是对个人遭遇和一些现象不满，但在文革的多次反复和群体抗争中，他们已经从政治生活常态来认识和理解问题，用时兴的道理来解释社会现象和问题，到运动后期，他们能够上升到理性上来解释了。

张建成在65年才从北京电力学院调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做团委工作。他明显感觉水院存在对北京调来的成建制的干部、教师的排外宗派情绪。而且在他的回忆中，梳理出水院党委中存在的公权私用，干部组织路线宗派化的问题。张做学生工作，“有一个学生

<sup>1</sup> 陈祖坤：《吹尽狂沙》，40页。

<sup>2</sup> 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152页。

叫谭伏生，湖南人，下面汇报说他有反动思想，而且很顽固。我找他交流，他的问题很简单，也很实在。简单讲就是说为人民服务，为什么领导与老百姓二重天。……为什么领导难得到一趟地里，做个劳动的样子，前呼后拥、拍照登报，还要拍电影放给大家看，想不通，特别举了刘少奇到湖南视察的例子。那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动思想。保卫科准备上报公安厅（作为反动学生）。我反对，并自告奋勇做工作。经过几次交谈，我感到他说的问题都存在，反映了毛主席早就批评的进城了，做官当老爷的一面。”<sup>1</sup>正因为在工作中张体会到了体制的一些现象问题，逐渐站到受压制的学生一边，带领团委干部造反。

武钢陈祖坤回忆，机务段段长“通过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聚集了一伙人，把持了全段。五湖四海变成了个人的天下。不与他一伙同流合污，“即使是一起从鞍钢调过来的人也要打击，如周国昌、张文治被他整去劳改和劳教。”后来在机务段搞所谓高效率、高质量、满负荷。在机务段一口气裁减了二百多人，被裁减的人个个怨声载道，体弱患病者更觉前途无望……有的领导干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干了很多这样劳民伤财的事，最终在文革中引发工人与当权派的尖锐对立。吃过亏的工人都非常痛恨他，文革中批判他，每一次都是群情激愤，发言踊跃，称他们是“黑帮团伙”。<sup>2</sup>

陈祖坤认为：“单位的领导对工人‘管卡压’，还要每一名工人在岗位上的劳动要‘满负荷’；同事都受到监督，不会向领导阿谀奉承的将被孤立、排挤和打击……为什么在单位里仍有一部分人长期受着歧视和不公平，我不能容忍这些，我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地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我遇到了不平的事，是一定要站在弱者一边，向强暴者讨回道理。多少年来我做过许多打抱不平的事，越来越遭到单位领导的反感和不满，长此以往我和单位的某些领导形成势不两立的仇视情绪，我在他们手下工作，心情压抑，举步维艰，千万不能犯错，一旦有一点不是，便会遭到灭顶之灾。”<sup>3</sup>

同在一个武钢，徐正全将问题提升到了体制层面：“1958年进厂的一批长期领二级工

<sup>1</sup> 张建成：《岁月留痕》，77页。

<sup>2</sup> 陈祖坤：《吹尽狂沙》，47-48页。

<sup>3</sup> 同上，51-52页。

工资的所谓‘五八二’，这部分人是生产的中坚力量，大多已成家，少者一个孩子，多的二三个，且爱人多是农村户口，在老家要劳力没劳力，要钱没钱，一家三四人仅靠每月三十八元多的工资，基本温饱都难以为继，生活极为窘迫……没想到堂堂中国的一流大企业里竟也有一帮类似的穷人。这口气总有一天要找点口子往外冒。而当权派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加之官僚主义日见滋长，根本就熟视无睹。穷人的一口气向谁冒？……这种官民之间的矛盾，不是哪个个人刻意制造的，而是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缺陷带来的必然产物。”

1

铸钢厂的李承弘体会到：“我这个民主人士的高干子女与共产党的高干子女含金量是不一样的”，李比一般工人感受多一层的是社会精英们也存在体制内外的差异。<sup>2</sup>

职工队伍中因籍贯不同、原单位不同产生的派系问题，这本为昔日码头商埠积淀的封建陋俗，也是老企业积存下来的问题，1950年代却在新型的国营大企业以改头形式露头角，在武重等也存在，为青年工人不解与不平。祝孝先回忆：“武重厂的派系实际上在文革前早就形成了，都是东北人当家，书记、主任、工会主席，车间的组长，全部是东北人。在厂里入团、入党、提干、吃救济的，也都是东北人。曾经有一个叫尹志全的工人，他是四川人，他不肯出工会会费，说不知道工会主席是谁选的”，一个全新的大厂，居然也如民国时期武汉的码头一样，因籍贯形成帮派，或结构调整、迁建形成帮派。而工人觉得这个工会是上级指定的，追求民主的主人翁意识萌生。这种情况在所有单位均已存在，如人大代表、先进人物、工会和班组、支部书记选举各种政治生活，已流于官样形式。

武汉国棉一厂工人王屏，作省革委常委后，接触人多了，就意识到：“以前总以为高级干部是为国家掌舵的，肯定就跟家里的‘上人’一样，把家人的未来都考虑很周到。后来参加革委会之后，才看到他们的动摇性比较大，跟着形势两边倒，没有工人那样纯粹。

<sup>1</sup> 徐正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安装公司工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安装公司革命委员会主任，因涉嫌打死人被捕，以故意指挥杀人罪被判死缓，后改无期在改判20年徒刑。引文见 徐正全，雪地足迹，29-30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

<sup>2</sup> 同上，82页。

张体学在当时说得很好听，后来又是另外一个说法。”<sup>1</sup>

武钢在成立了革委会后，军人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时，竟然造成61人非正常死亡，运动初的白色恐怖再现，造反派被造反。武钢工人杨玉珍，后结合到省革委任常委，她还结合现实分析：“王任重下台时做检讨，说做多了坏事，自己伤了许多人的心，王任重哪有他们今天伤的人多。”<sup>2</sup>她谈到旧有体制在文革后的进一步发展固化，乃至不如王任重时。交通厅的付廉说自己入党提干后，进入体制接触干部多了：“慢慢发现共产党当权派不是毛泽东原来要求的那个样子，有的人官做的越大，犯了大错误反而没有事，群众和下级是他们的垫脚石。我这个人因为脾气犟，看见当官的做坏事，一样起来指责，因此就埋下了祸根。”<sup>3</sup>

张一帆回忆：自己从六七岁记事开始，亲眼所见所闻，看到共产党基层干部中间的很多人，虽然职位很低，文化和理论水平也很差，但是对老百姓却是张牙舞爪。刚刚解放的时候，李先念在水陆街的大礼堂做报告，往往就只带一个警卫员，吃东西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干部租住人家的房子，也一样帮助打扫院子，大概直到1953年都还是这个样子。从55年到57年，那些整人的人上去之后，党群关系就恶化了。在1957年之后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解放前写的许多批判国民党的文章，现在对于一些基层干部也很恰当。他的认识几乎带有普遍性，民众按照革命理想主义和原教旨的理念，对新社会存在的旧现象提出疑义。

66届高中生柳英发<sup>4</sup>是团支书，班上干部子弟多，高知子弟多，工人子弟少，“干部子弟一般不找我谈话，而且他们普遍成绩不好，我对他们也很冷淡，不发展他们入团……后来他们都说我过于看重学习成绩和才能，不突出政治，甚至是说我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柳对干部子弟在生活上浪费粮食，回家带高级点心返校也很不满，“当时困难时

<sup>1</sup> 王屏，女，党员，劳模，工总国棉一厂分布一号勤务员、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隔离审查3年，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2003年访谈。

<sup>2</sup> 杨玉珍，女，武钢机械总厂工人，劳模，九一三勤务员之一，后结合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受到审查，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2003年访谈。

<sup>3</sup> 付廉访谈，同以下张一帆的回忆，均2004年访谈。

<sup>4</sup> 柳英发，省实验中学学生，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引文系2003年访谈。

期还没有完全过去，许多干部子弟因为家里吃得好，早餐的馒头嫌不好吃，不吃完就扔掉，我和另外一个工人子弟因为家里没有小灶，还感到吃不饱，有时还趁人不注意偷偷捡起来吃掉。”

一些意欲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文革骨干造反的人，试图将其动因简单归结于经济利益和私欲，并未深入分析他们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从现有典型人物的口述与回忆录分析，确实存在部分穿衣吃饭、待遇等生活问题，但最普遍和尖锐的问题，基于群众对共产党进城后逐渐形成的等级森严和官僚化现象极为不满。

诚然，造反派骨干们当年对体制的疑惑，还停留在一些表层现象上，他们对毛泽东时代业已发生和存在的官僚化与腐败问题，仅仅了解一鳞半爪。30岁上下的人，从内心是把他们理想化的共产党、党政干部的抽象革命形象，和现实干部与结构性弊病作简单对比。

#### 四、早期运动中传统思维及相关社会现象

在北京南下造反学生和本地造反大学生的串联推动下，最早的武汉中心城区工人造反结社在各种企业少数年轻、激进工人中酝酿。在最典型的底层市民社会的汉正街，带头者如武汉机床附件厂彭国华等，武汉第二机床厂余平等，武汉精细医疗器械厂丁喆生等，武汉工艺雕刻厂胡国基……成立了“武汉地区少数派工人联络站”。组织者非大战线的中小厂、行业部门和区办厂的工人和小干部，周边汉口传统的老商业街区一些区办、街道办小厂和的职工，最先成为活跃分子，近现代著名的码头商业街区，涌现出一批草根造反者，一些对武汉文革运动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多少与汉正街有关联。汉正街住民胡国基后来回忆<sup>2</sup>，他们进一步筹备“工人总部”，一些基层党员或小干部也开始进入班子，国营大厂大单位人员卷入参加。沙云乐回忆：“武汉开始酝酿成立工人总部的时候，有92个人，我参加过最开始的几次会议，朱鸿霞说要去总部，我要在单位内部开展运动。根据中央九五命令

<sup>2</sup> 参阅胡国基手稿：《幸存者说》，2004年。

的精神，长航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概是1966年8、9月份的时候，我到青山船厂做了第一次讲演，那里产业工人比较集中，在我讲演完后，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海员工人战斗总团第一团。我到二航局讲演之后，成立了第二团；然后依次是港务局成立第三团，航管部成立第四团，最后学校医院都起来了，一共成立了18个团，总团设在长航机关里，总团是直属团。”<sup>1</sup>所以武汉工运的传统产业工人——海员群体，也较早投入进来，参加过组织工人总部，但按系统独立存在。

家庭出身好的余平害怕队伍急剧扩大，因组织不纯、行为极端而出岔子，执意退出领导班子，刘超群也随余平一同退出。恰好锅炉厂的李洪荣<sup>2</sup>、铸钢厂的胡厚民<sup>3</sup>加入，增添了力量，他们是党员，立即进入了领导班子，填补了讲策略者退出的空缺。

胡国基回忆：“不久武汉重型机床厂胡崇元<sup>4</sup>到来，李文祥更是喜得不得了，他在服务员会上提出，现在有了四个党员，可以成立一个党小组了。这四个人是党员，我们无话可说，可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当即发言：我们刚刚甩掉了婆婆的约束，现在搞了群众组织，又搞一个婆婆来管束。现在全国的党组织都瘫痪了，都在接受考验、接受检验。难道这个党小组就是完美无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丁喆生折衷表态，建议以后再考虑。他说，按共产党的组织条例来说，他们党员可以自行建立党小组，我们非党员是无权干涉的。就这样，除我之外，没有人持坚决的反对意见，党小组就这样在大家心情不愉快的情况下成立了。李文祥是老资格的服务员，在单位又是党支部书记，另三人是新来的，自然推选李文祥当了小组长”。<sup>5</sup>汉正街出身的他，尽管没有公开反对，但以该地区典型的“码头”意识在隐隐发作。武汉地方俗语——带封建意识的“打码头”，恰恰是在汉正街首创，并蔓延到旧的商业城市的。

<sup>1</sup> 沙云乐，长江航运公司干部，做过平台划线工、部门学校教师，曾任长航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审查、关押，后按交通部精神解除审查。2004年采访。

<sup>2</sup> 李洪荣，武汉锅炉厂工人，市劳动模范，曾为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

<sup>3</sup> 胡厚民，武昌铸钢厂工人，党员，工人总部早期组织者之一，任工总二号勤务员、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判重刑20年，死于狱中。

<sup>4</sup> 胡崇元，武重工人，党员，曾为工总勤务员。

<sup>5</sup> 胡国基文革回忆手稿：《幸存者说》，2004年。

在刚成立的造反工人组织中按常规建立党小组，这是很有趣的一例，但似乎可以感触到工人的正统党建意识和某种历史的痕迹。即在1950年代初批判工运中的“工人至上”、“经济主义”、“工团主义”错误思潮后，在工会与党的关系重大调整后提出这个问题，也非偶然。除了造反与保守思想分歧外，在批判资反路线前提下的造反队伍中，强调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传统倾向，和追求工人自行结社意识的人，自然存在心理抵触。尽管青年工人们并不了解该问题上的党内斗争究竟如何，但在武汉工运中的实际社会影响是深远的。尽管这里仅是胡国基一个人表达了不愉快，却是不少人在文革中一直思考的舞台。实际上本地军政当局也难以正确把握局势，初期武汉工人造反运动，按群众自己的感受与理解，自行阐述毛泽东思想路线，超越常规党组织概念的工人独立意识一直较为强烈，以致受到各时期党政当局的注意和压制。这一点显然与共产党强力控制的上海不太一样。

有人说：朱鸿霞和胡厚民成了工总的核心成员之后，就提出：‘像彭国华、胡国基都是一个小厂子里的，领导产业大军只有我们武重啊，武船啦，武锅！’啊！这个调子唱出来以后，彭国华就感到不妙。……一说是武重、武船和武锅排挤他们，把他搞出来的；一说是他们搞小组活动……彭国华就想，借助农民这股子力量，抗衡这些大厂子老爷们。<sup>1</sup>大企业出来的新头领们优越感强，采用了“火并王伦”的办法排挤了小打算、激进的先行者。造反派体制身份观念很强，基于经济形态导致身份的不同，不同体制的工人政治名份差异，不同性质企业的造反群体相互有看法，产生冲突与内讧，而初期的内讧和相互攻击材料，发展到后来的种种派性，继承着旧时武汉特有的争地盘“打码头”底层恶风与市民社会的种种习俗。

尽管武汉党政军体制的重心在行政区武昌区，但行政、文化区的造反学生和产业工人队伍相对集中和强大，传统商业区的汉口产业工人和其他职工队伍相对分散，但多数市民热情支持造反派的反体制批判“资反路线”行为，而抵制文化革命的保守力量也相对强大。

<sup>1</sup> 2007年8月11日，王芳访问彭勋谈话记录，见其硕士论文《记忆中的底层文革》，2008年。彭勋为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革命造反临委会常委、宣传部长，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其实，早在1966年底，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就保持着对工运崛起的警惕。参加省常委会的陈再道，比省委领导更敏锐注意到事态的发展；12月2日他在省常委会上说：“另外工人（运动）有发展趋势，工人也相当复杂，还没有红卫兵好搞，要有思想准备”。20日省常委会上，他再次提出：“对省委逼，也是一个教育，……他们正在搞材料，任重确有错误，他们搞他，而且是最大的一个……现在不是对付少数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工厂的工人”。<sup>1</sup> 陈再道从一开始就一直对武汉工运有体制性强烈忧患意识，1967年春决定取缔工人总部，抓捕工人头头数百人，实非偶然。（陈早年投身土地革命，他对工运异常警觉令人感兴趣）

与中南地区或长江沿线市民社会较为发育的某些城市不太一致，武汉造反工人组织似乎坚守大革命以来形成的概念，要固守产业工人为核心这个概念，一直在一些风云人物口中叨念不断。这可能是权力很快转移到武重、武船、武锅这些国营大厂领头者手中的原因之一，他们人多势众，有文化有见识，特别有产业群体的桂冠。武汉是工人运动十分悠久的城市，在年青一代工人，特别是具有一定新社会文化教育的工人心里，确实很看重体制条件——国营与非国营、大厂与中小厂、个人文化政治素质差别、家庭出身差异的体制性概念。这也是后来工总与工造总司闹矛盾时流传甚广的看法，67年元月大联合夺权时，流传出胡厚民们瞧不起工造总司战友，贬低他们，居然认为他们都是“卖烧饼油条的”，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其实仅仅厂小一些）。“七二零”后对武汉的大联合，胡厚民也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的，认识相当传统，想用传统意识规范群众组织，而他却被当局确认为最有独立工会倾向的造反领袖，否则怎么会和朱洪霞、李想玉<sup>2</sup>、吴焱金成为1969年“反复旧”的领袖呢，他们那个“人类解放我解放”号召以工代会名义发动“反复旧”，振动了中共“九大”时的武汉三镇。当局眼中的武汉“反复旧”，就是1960年代对抗中共中央

<sup>1</sup> 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131页，银河出版社，2005年。

<sup>2</sup> 李想玉，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战斗兵团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后被关押十余年，撤销一切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免于刑事处分。

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

当然，工造组织的多数成员，实际上决非所谓的餐饮作坊的“小生产者”与小厂小企业的，其领导核心，除吴焱金之外，还有市物资局仓库、肉类联合加工厂、低压锅炉厂、区邮电局、紧固件厂、胶管厂、橡胶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基层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

本文样本群中，有数人在50、6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高职和中专训练，数人参加工人函授业余教育（如胡厚民），一些核心人物是厂工人业余文学、从事宣传社会活动分子。在文革的历程中，他们的文化与理论追求较为突出，即从文化层面追随这个革命运动较有兴趣，这和他们大多年轻，颇具一定教育水平、关心时事有关。实际上，他们和共产党传统概念中的新“产业工人”说教较为接近。与造反派工人组织相比较而言，后来成立的御用工具“百万雄师”十三个常委，反而皆非国营大企业产业工人，他们中有9人是市局机关、系统二级公司、中小企业的小干部，9人系文革前党员，含转业军人，有3人在文革结束平反后入党，一人加入民革；除一人高中毕业之外，其余头头学历均在初中和小学程度，缺少业余文化训练的记录。他们所在单位有市机械局、永丰公社、帆布厂、列车站、生资公司、仓储公司、竹木公司、基层房管所、街道办事处、铁道医院等。所以从这些头头的身份和经历看，富有体制性干部队伍的思维惯性和科层制最基层思维和行为特点。

现在回忆起来，一些人认为胡厚民等钢派头头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的思想也与当权派蓄意挑拨离间有关，即文革中的体制参与搅合了群众组织的派性。“七二零”后新的军区领导人开始就倾向于所谓“钢派”。柳英发说：刘丰曾经对钢派头头煽动说，你们钢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商、统战对象。“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鸿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时都揭发过此事。1973年张体学患癌症临终前，还把新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说一定不能给钢派头头掌权。<sup>1</sup>杨道远也认为：“钢新打派仗，曾思玉是最大的黑手。他们制造分裂，分而治之，有利于他们对付、控制造反派。钢新两派都以为有军区撑腰，打得不可开交，哪知道都上了别人的圈套，跳进了别人设下的陷阱”。

<sup>1</sup> 《烈火永生——怀念胡厚民》，36页

1

受到所谓的以大厂产业工人为核心的观念影响，导致造反工人队伍出现分化与派性冲突。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此外确实还有一个较工人总部成立略晚的“赤总工二司”，全称为“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武汉地区红色造反者革命阵线总会”，被人忽略。其组织成员基本上是由湖北省各专县和武汉市的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外包工、民办工厂等工人组成，其社会身份又居于国营、集体企业工人之下。与工人总部和工造总司相比，这是距离传统产业工人身份更远的群众组织。其武汉地区达20多万人。1967年1月，酝酿夺权时，支左办公室对他们的头头讲，根据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指示精神，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外包工不许参加夺权。所以一开始就对他们的革命权利有限制，官方和其他群众组织，都把他們看成是闹经济主义的行会组织，入了另册。但是其成员在文革中斗争性强，造反早，行为模式较其他大中企业工人要激烈得多，他们争生存权、争政治权，对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的临时工、合同工用工制度改变要求强烈。该组织类似上海的“红工司”——又没有解散，以致坚定地参加了1967年的种种造反派社会活动，但“武汉事件”后改组的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区，都十分清醒地采取了排斥赤总工二司态度，三钢、三新等各学生造反派组织也严格划清界限，较少和赤总工二司来往。此后的政治运动，其主要骨干成员在单位都受到压制、迫害。<sup>2</sup>

## 余言

这里没有去讨论工人与职工队伍何以分化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的问题，但从以上造反派骨干回忆文革初期的种种遭遇，读者不难看到，决非某种简单和表面的个人经济利益与性格差异导致了社会的撕裂，恰恰是文革以前业已形成的社会分化、个人政治身份的强化，一部分民众受到歧视，形成弱势，对民众的压制，预埋并促进了武汉社会的族群分化，其

<sup>1</sup>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序”第5—6页。

<sup>2</sup> 见系统访谈材料“赤总工二司简介”（钟逸，2015年）。

中一部分工人与学生、小干部日益反感官僚化倾向，同时也蔑视官场（及官宦子弟）脱离民众的虚浮作风与生活方式，反对人为僵化党群干群关系，反对把阶级斗争变成为对个人的斗争、对民众的斗争。

不是别的，恰恰是压制和镇压群众的恶劣行为，促进了高度紧张、造成社会撕裂，把大家似乎都赞同的“阶级斗争”推到顶点，一部分人感到极其压抑，党政体制则兴盛说假话、宣传升平景象。一部分干部和骨干，在这种日趋严重的社会异化中提升了政治身份，随之享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他们满足于在人民群众中不断地开展对敌斗争，压制新的所谓敌对分子，抬高和巩固自己身份，一些人更为追求个人发达，趋炎附势，退失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

为了保持和维护这种利益，所谓保守派中的某些人一开始就盲目跟随在群众中讲究所谓“出身”“横扫牛鬼蛇神”，发展到后来，武汉“百万雄师”特别强调“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口号，体现出文革群众对立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它赋予部分人的盲从意念与专政使命。也是这种所谓的使命性宣传，导致社会法西斯化的暴力抬头。一些思想特别顽固的人，则成为官僚专制体制的得力打手与捍卫者。在这一点上，造反派与保守派确实是有派性分歧的，从本文列举的社会学问题看，这种分歧也不是无原则的。造反派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地位，必须争取摆脱专制奴隶的命运，争取合法的革命者地位，保守派必须维持官僚体制下新贵的命运，拼死不成为众人指责的保守派——即当年大家都简单地理解的新时期右派——前途也是可畏的。身份的沉浮、拼死的抗争，已为全社会瞩目。■

【考证】

##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三）

### ——关于杨尚昆“秘密安放窃听器”问题

余汝信

#### 一、《戚本禹回忆录》关于“窃听器事件”的说法

戚本禹称，有关杨尚昆的“窃听器事件”，是1964年发现的。戚又称：

杨尚昆受审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在毛主席身边秘密安放窃听器的问题，一个是泄密的问题。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乎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

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

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查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查。

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sup>1</sup>

## 二、文革期间中共官方和群众组织的说法

### 1. 中共官方说法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sup>1</sup> 《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87-388。

内中提及：

(二) 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

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

(1)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2)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

(3)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4)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 2. 群众组织材料的说法

1967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称：

大特务杨尚昆在他的后台老板刘、邓及大党阀彭真、大军阀罗瑞卿的支持包庇下，为了达到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卑鄙目的，长期以来，背着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安设窃听器，窃听偷听偷录毛主席的讲话，盗窃党的核心机密，为四大家族反革命政变集团提供情报，进行反革命阴谋政变的罪恶活动。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发现后，严厉指出这是一种贝利亚特务活动，并且指示追查是谁搞的，查出来要开除党籍！但是，杨尚昆狗胆包天，对毛主席的指示，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地进行窃听活动，由过去使用的有线窃听器，改为无线窃听器，继续在六〇、六一年大肆偷录毛主席的谈话，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这个政治阴谋，不仅和国内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相联系，而且和国际上的反革命政治背景相联系。一九六一年四月，毛主席第三次发现有人搞窃听，责令邓小平彻底追查。邓竟违抗毛主席的指示，让杨尚昆主持这件事。这样，他们贼喊捉贼，玩

弄一系列的阴谋手段，和他的死党采取“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反革命手法，向主席和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欺骗主席和中央。当中央决定将过去所有窃听偷录的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录音胶带销毁时，他又抗拒中央指示，背着中央把讲话录音连夜组织人抄下来，继续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sup>1</sup>

### 三、杨尚昆本人的说法

19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时称：

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sup>1</sup> 中共中央办公厅文化革命学习班“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的滔天罪行》，1967年8月20日，页9-10。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他们几个青年人就是这个时候调来学速记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sup>1</sup>

<sup>1</sup>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页97-99。

#### 四、中央办公厅一些老人的说法

1996年9月至1997年3月，杨尚昆请中央办公厅一些老人到他的住地北京小翔凤胡同5号共忆往事。在谈及“秘密录音”问题，老人们纷纷发言称：

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要进行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会前，毛泽东对叶子龙说“今天我的讲话你们要录音”；1958年7月，毛泽东先后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要录音；1960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外出巡视期间多次会见外宾，指示要录音，还叮嘱在发消息时，新闻稿要与录音核对，并需经他本人审阅，做到准确无误。

毛泽东第一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录音问题提出批评。为此，杨尚昆郑重地召开了有中办各局、室、馆负责人参加的厅务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评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严肃地提出如何改进办公厅工作问题。但是，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上的讲话如果不录音，不留下点记录，就是失职。中央办公厅是要对历史负责的。中办机要室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60年4月，提出一个明确录音范围的报告，建议：（一）中央大型会议；（二）中央召开的中型会议；（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报告；（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五）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六）兄弟党领导人在我们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录音的讲话和报告可以录音。此外，一律不准录音。这个建议本来是好的，但是，杨尚昆出于谨慎，没有接受机要室的意见，还是坚持一事一议，遇有确需录音的情况，杨尚昆都要请示邓小平、彭真，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才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

毛泽东第二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61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汪东兴告诉他，会见客人时准备照相和录音。毛泽东就很不高兴，责问是谁批准录音的。本来，毛泽东外出随行人员名单都需经汪东兴审定，这次带录音员随行也是汪东兴安排的。毛泽东说，这件事你给我查，你马上给总书记打电话，让他查。5月1日，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机要室会议科科长赖奎乘专机去上海（当时毛泽东已由长沙到上海）汇报情况，但是，汪东兴却不让康、赖二人和毛泽东见面，对康、赖说，毛主席委托我同你们谈，谈的情况搞个记录送给主席看就行了。最后，汪东兴说，主席叫我们照个相，留作证据，就让卫士长沈同在一张纸上写了“违反指示，非法录音”8个大字，压在录音机底下作为背景，请摄影员吕厚民照了四张相，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康一民、赖奎、刘吉顺<sup>1</sup>五人合影，一张是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三人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还有一张是录音机的照片。照相以后，康、赖就回北京了。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顾全大局，承担责任，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报告没有涉及汪东兴，叶、康、吴三人受了党纪处分。<sup>2</sup>

## 五、《杨尚昆日记》的注释

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对杨尚昆1961年4月29日日记中“3时到5时，约叶、康、王（原注：叶，指叶子龙；康，指康一民；王，指王敬先。）、高智、罗光禄、龚子荣等同志谈关于录音问题的情况”一段话作出如下注释：

[1] 指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对毛泽东外出视察的谈话进行录音的情况。

为了准确、完整地保存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曾对中央召开的正式会

<sup>1</sup> 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

<sup>2</sup>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页100-101。

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进行了录音。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他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和同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也进行了录音。195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杭州会议上，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并批评了搞录音的做法。1961年1月底至4月初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后，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汪东兴所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不准搞录音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5月17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利用“录音问题”，罗织罪名，对杨尚昆等同志进行政治迫害，株连了大批干部。198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提出：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二、“借录音问题强加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三、“1961年1至4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同志是没有责任的，因而1961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销。”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同日，中央办公厅把这个复查报告作为《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一起报中央书记处，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于1980年10月23日印发至县、团级党委。<sup>1</sup>

<sup>1</sup>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页716。

## 六、戚说与其他说法的差别

将《戚本禹回忆录》中有关“窃听器事件”的说法与其他方面有可靠来源的说法相比对，在以下几方面存在着大的差别：

### 1. “秘密录音”或称“窃听器事件”被查处的时间

戚说是1964年“发现”或称“被查出来”的。文革期间中办群众组织则指“一九六一年四月，毛泽东第三次发现有人搞窃听，责令邓小平彻底追查”。杨尚昆本人，中办一些老人、《杨尚昆日记》的编者均称查处时间为1961年4月间，原始资料《杨尚昆日记》中的记载亦证明1961年4月说是准确的。如日记1961年4月26日记载：“晚间子荣同志来电话，要求明天下午赶回北京”；4月27日：“5时20分到达永定门车站，……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晚间同康一民谈了一下”；4月29日：“上午……又约叶子龙、康一民、王敬先等三同志谈话。3时到5时，约叶、康、王、高智、罗光禄、龚子荣等同志谈关于录音问题的情况”；4月30日：“上午看了叶、康、吴的报告后，提了意见由康去改。与龚子荣同志等谈话”等<sup>1</sup>，均与“秘密录音”问题有关，就是绝好的证据。

### 2.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办的主要原因

因为戚的1964年“发现”说不实，接下来戚的“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这样的说法亦就更无事实依据。

1965年杨尚昆调离中办的主要原因，是要为当时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出了大问题”的“泄密”（杨称“失密”）事件承担领导责任。文革期间，中办群众组织对杨“泄密”问题指控为“杨尚昆和大军阀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向荣、曾三、裴桐、叶子龙、康一民等相勾结，将大量党的机密档案从中央机要室和中央档案馆盗窃扩散出去，

<sup>1</sup> 《杨尚昆日记》（上），页711-717。

并且广为流传，层层偷抄，为反革命政变集团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党进攻提供弹药。”<sup>1</sup>

“失密”一事在《杨尚昆日记》中有迹可寻，如1965年9月16日日记记载：“晚间约中央档案馆、军委办公厅、保卫部、军事学院等单位同志，谈如何清理过去已外流的档案问题”；10月29日：“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上午10时半，周、邓、彭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10月30日：“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约李质忠同志谈话（办公厅党委问题，停止出文书处理）。下午同曾三同志谈了档案馆的问题。失密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我虽然抓了这件事，但终于出了大问题。曾对此缺乏重视！”<sup>2</sup>

到了1966年5月处理“彭陆罗杨”问题时，才将杨“泄密”与早已处理过的、1961年的“窃听器事件”两笔账一起算。

### 3. 杨是“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吗？

《戚本禹回忆录》称，“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罪证是“里面除了小录音机，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

戚对杨的指控可谓耸人听闻！这是除戚之外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说法。文革中什么都可以翻个底朝天，据中办老人们说：“‘文化革命’一开始，当时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煞有介事地派人在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和中南海内各办公室、会议室普遍搜查所谓窃听设备，当然一无所获”<sup>3</sup>，故此，当时中共官方、中办群众组织和其他造反派在批判杨尚昆时，亦从来没有过类似戚本禹所称在毛的“卧室和洗手间安放窃听器”的指控，文革结束后官方对杨的审查结论中更无类似说法。更不要说当时的技术条件是否可能有“米粒状”大小的窃听器材？其无线传输的范围有多远？在那儿接收信号又不会被人发现？负责毛警卫工作

<sup>1</sup> 中共中央办公厅文化革命学习班“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的滔天罪行》，1967年8月20日，页10—11。

<sup>2</sup> 《杨尚昆日记》（下），页670—682。

<sup>3</sup>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页102。

的汪东兴知道并允许这样做吗？如此说来，戚在文革结束四十年后如此耸人听闻的说法，不是比当年造反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吗？！说实话，造反派也没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这样离奇的故事。

杨尚昆历史上主导过的、曾经对毛的会议、办公场所进行过的录音，无论对错，都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工作上的需要。但如果对毛的卧室、洗手间安放窃听器，却是中共党内纪律绝不允许的刺探领袖个人私生活的敌对性阴谋活动，一旦被发现，就是弥天大罪，戚难道不明白这两者性质上的天渊之别？退一万步说，如果杨尚昆真的指使人这么做，他的目的何在？他的行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戚本禹在文中没有解释，说实话也根本解释不了。因为这是戚自己想象、捏造出来的虚构之物，如何能够解释清楚？

根据《杨尚昆日记》注释中的说法，“秘密录音”一事查处后，分别给予当事人叶子龙、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吴振英以警告处分。这样做，是要给毛一个交待，其实处分并非十分严厉。群众组织的材料称毛说“查出来要开除党籍”，事实上并未有任何经办人被开除党籍。叶、康、吴三人其后均调离中办，到北京市、国务院三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担任了相当的职务。文革结束后，叶子龙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康一民曾调回中办，任中办副主任；吴振英也曾任三机部办公厅副主任。从叶、康、吴三人文革前后的际遇来看，有关部门并没有将“秘密录音”看成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更没有将当事人与什么阴谋活动相联系，这也可从侧面说明，戚本禹将此事说得那么耸人听闻，绝非事实。■

2016年7月

【字清谈画】

## 那些年，我们是怎么画画的（四）

——膜拜“最新最美”：“现代年画”视野里的中国新文化

王宇清

### 一、从“咸与维新”到膜拜“最新最美”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儿童题材年画

描绘新中国少年儿童的美好生活

“咸与维新”，即所谓反对旧的，提倡新的，巴望一切都快快布新除旧，号召所有国人都认同并参与。自“戊戌维新”之后百余年来，这是在中国所发生的一个重大文化及社会风向的转变。

作为一个崇尚传统的社会，中国自古以来，对过往的时代总是心怀敬意，总虔诚地面对古人和前辈，对古圣先贤的言行规范典章历史历来亦步亦趋。继承传统使其发扬光大，是我们社会自古以来文化的特点和风俗。

然自打清末国门被打开，鼓吹“咸与维新”的时代风气席卷大江南北，国人们的眼里和心中，一个观念即开始越来越深地被植入，那就是，在一个不断变更的新时代中，唯有“新”才是“好的”。而“美”，作为一种新价值理想，追求它，则是必须！

## 二、“新的”就是“好的”



50年代初期的年画《农村风光》——现代年画所描绘的“新农村”

在笔者收藏的近现代年画出版物中，无论题材还是内容，颂扬“新人”，描绘“新事物”，讴歌“新社会”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现代年画与那些内容和题材多少年总一成不变的传统年画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此。

笔者曾在多篇评论中指出，所谓“新的”即“好的”这一价值观的渐渐流行，和国人逐步接受科学主宰世界这一观念上的转变大有关系。

起源于西方的科技革命，很快又导致工业革命的爆发，这两场革命，加之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等文化与社会运动的相互呼应，欧美进入了一个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科学推动工业，工业改造社会，社会则开始不断产生出新的文化思想观念。以创新为导向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使一种“尚新”的文化——热衷和追逐时尚之风——被催生了出来。

如所周知，在上世纪曾广为风行的“现代年画”这样一类充斥着“时尚”内容——新人、新事、新社会——的美术印刷品中，我们已能颇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风尚对风起云涌的“新文化”有力的呼应。

20世纪中叶，科学主义、工商文明以及新文化成为主导中国的主要力量，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急遽变革，新的国家政权建立。新政权建立后，进化与进步的观念更进一步获得了正统地位，所谓“进步”与“革命”成为一种人们向往的生活。强烈认同“新事物”“新生活”“新社会”，渴望和争取做“新人”，不但逐渐成为国人普遍的愿望，也被看成是一种“政治正确”。“新文化”对社会的改造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新的”即“好的”这一观念，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似乎已经天经地义的了。

### 三、“美”通往“善”？



20世纪60年代年画《春暖早出勤》

爱劳动的人在所有时代总是美好的典型

前面说过，现代世界是由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现代化的人类不但想要拥有强大的力量来征服世界，还要用美来改善环境，美化人所有的一切。

认为人应该追求“美的生活”这一现代文化观念，和中国古代士大夫注重“境界”的人文情怀似乎颇相类似。因此，当19世纪后半叶西方工商文明大举进入中国之后，相伴时尚文化的迅速流行，用“美”提升生活中的一切，被越来越多国人当做俗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人生目标甚至终极的价值理想。

### 四、“新与美”的政治、社会及文化

崇尚新事物，热衷新文化，认同新社会，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讲，他就会被判定为：政治上正确，文化取向上正常，且能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然而曾几何时，我们文化一直都是以古为师，以传统为本的！在那种传统语境中，人们会不断向文化的源头致敬，向传统，向历史悠久之物表达缅怀之情。那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也与目下丢弃了传统的“新文化”大异其趣。譬如，曾经的古人就特别雅爱用太湖石装点庭苑，即取其形状怪异，有“老瘦透漏丑”等诸般样貌，石头虽有种种丑陋，却恰恰寓意了历经沧海桑田和饱受雨雪风霜。这种经岁月斑驳后留有遗痕的事物，反被彼时文化语境中的文人们所推崇，当做一种人生的感动，一种情怀的寄托。既如此，古人极力推崇“老瘦透漏丑”的趣味，和今人“唯美唯新”的追求，在文化与审美的取向上便渐行渐远。

这种两个时代在审美上取向的殊异，在宋以后的画作中亦可得到诸多印证。尤其到了元代，中国的文人画以逸笔草草、空疏简淡为趣味标格，拒绝了此前精描细画的路数，认为那是没有文化的匠人才孜孜以求的画法。

但到现代，以新派年画等时尚美术的风行为转折，文人画等一类艺术这种对境界和品格的诉求，便迅速被崛起于民国的商业文明逐渐边缘化了。月份牌、政治宣传画、新派年画等时尚美术紧跟文化变革的脚步，成为“新文化”表达一个重要的面向——世俗向度。

然而曾几何时，我们文化一直都是以古为师，以传统为本的！在那种传统语境中，人们会不断向文化的源头致敬，向传统，向历史悠久之物表达缅怀之情。那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也与目下丢弃了传统的“新文化”大异其趣。譬如，曾经的古人就特别雅爱用太湖石装点庭苑，即取其形状怪异，有“老瘦透漏丑”等诸般样貌，石头虽有种种丑陋，却恰恰寓意了历经沧海桑田和饱受雨雪风霜。这种经岁月斑驳后留有遗痕的事物，反被彼时文化语境中的文人们所推崇，当做一种人生的感动，一种情怀的寄托。既如此，古人极力推崇“老瘦透漏丑”的趣味，和今人“唯美唯新”的追求，在文化与审美的取向上便渐行渐远。



与传统文人绘画追求超脱凡俗迥异，现代年画之类表现时尚的美术反其道而行，把传统文人画所贬斥的世俗生活，作为自己所要描绘的主体。这就决定了新派年画必须要具有能深入刻画现实，对现实生活进行写真的技法。恰逢其时，月份牌画家中一位叫郑曼陀的安徽人，开创了结合中西的“炭精擦笔水彩画”这一新画法。由此一种能深入描绘细节，能逼真进行写实描摹的画派被开创出来，而这种“中西合璧”的绘画技法，也为1949年后新政府大力推出的新派年画得以广泛地去表现世俗生活，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

用这种新画法画出的月份牌广告画，其描摹现实的逼真感着实让人讶异，画家们运用这种手法细腻地表现人的肌肤质感，甚至把头发丝都能画得纤毫毕露。当时就曾有人评论这种画法的妙处，称其画人物有所谓“呼之欲出”之感。

对于习惯观赏线描及平涂画法的国人来说，“炭精擦笔水彩画”，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视觉经验。这种画法的特点在于，不强调画面的明暗调子，而是以炭精擦笔画出轮廓与体积感，再以水彩敷色，利用水彩的透明和渲染造成皮肤质感，画面人物立体感强，面容白里透红，肌肤光洁细腻而滋润，栩栩如生，极为适宜表现年轻女子或秀丽或丰满的阴柔之美。正因为此，这种画法绘制出来的月份牌画，一时间风靡上海等大城市以及内地东部中部等文化相对开化省份的城乡，甚至远销海外华人地区。

1949年之后，月份牌虽很快就衰落了，但炭精擦笔水彩画法却在不几年后重又回归，如上所述，它成为了当时由官方出版社大量印制推出的现代新年画创作中，既频繁运用又曾不时引起一些争议的重要绘画技法。

## 五、现代年画：“新美价值观”统治的世界

应归属于“世俗美术”的“现代年画”时代色彩与气息极为强烈，从艺术技法与风格上看，其又可大致分为三大类。其一：从20世纪初叶的上海“月份牌”广告画演变来的“月份牌风新派年画”；其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成形的“新工笔”风格中国画；其三：

就是起源自中共根据地或解放区的，从“民间木版年画”风格变化而来且最具民间趣味的流派，笔者权且名之为“平涂法传统年画”，等等。



对于这三种主要年画类别，论者曾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是：专业美术工作者的艺术偏爱次序是从后往前，越往前，他们认为越世俗商业。而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则恐怕会恰恰相反，会给出反向的好恶排序。特别是新社会翻了身的农民们，其偏爱好恶几乎都会选择从前往后的排法。

看到过著名美术理论家刘骁纯对上述现象的观点，对此现象他曾指出，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偏爱，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革命根据地时就表现出来了。那一代元老级的美术工作者们见到老百姓家中的老剪纸、老木版年画，就犹如发现了被埋藏的珍宝，并把改造旧木版年画作为新年画创作的重点。那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改造利用自己早年在上海亭子间曾经见到过的月份牌广告画，潜意识的原因，是他们压根未曾正眼看过那种画。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赛过马蒂斯”、“气死毕加索”之类盛赞民间美术的言辞，仍在这一代老美术家的谈论间不绝于耳。

但是，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月份牌风格却是都市里吹过来的新时尚，而都市就是当时一般农民向往的明天。

这种由炭精擦笔画法所表达出来的令人感觉“光鲜亮丽”的写实趣味，用来描绘当时新社会、新时尚、新生活自然非常的合适，而当时这类年画的任务，就是颂扬新时代里种种时尚新风与新的成就，歌颂城市和农村中的新风貌、新气象以及种种美好的愿景，对于作为软性宣传工具的新派年画，这样的宣传是责无旁贷的。



这样的一类描绘，比如，农村中新购置的拖拉机，城市里在建中的新大楼，骑着新买自行车喜洋洋的男女等新鲜景象；又比如，新社会里新的人物，那些衣着光鲜皮鞋锃亮的幸福儿童，那些采买完年货笑呵呵归家的合作社社员，那些意气风发的劳模和英雄，等等。凡此种种，都尤其会受到当年那些文化虽不高，却在趣味上情感上与这类时新大众美术天然亲和的普通民众极大的赞赏。年画能够风行于那个年代，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 六、“最新最美”：年画里时代精神的密码



“社会主义新人”的经典之作：

20世纪60年代年画《小保管上任》

现代年画与传统年画还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官方宣教工具的面

目出现的。但由于它对所在时代广泛的反映及有效影响，且又时刻跟随时代的脉动和群众心理变化，从而也获

得了一般的大众的欢迎，反映了那个时代主流文化的趣味。因此，笔者坚持认为对其进行适当的反思，或权可作为对那个年代精神密码的某种考察。考察现代新派年画，不由让人想起当年那个“要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著名口号来。这个“最新最美”作为一个关键词，其背后若隐若现的，是否就是那个时代精神密码的某种折射？

我们已经列举过，现代年画中有相当比例的作品都曾不遗余力地赞美新社会，讴歌社会中的新事物，以及描绘置身其中的“社会主义新人”。通过观看那时这类画作中颂扬“心灵美”“劳动美”等等内容，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年画的创作种那种试图美化“新社会”之一切的努力。

通过多年对现代年画的收藏、欣赏与梳理，笔者也在不断思考年画中这一一味“尚新”和“求美”取向的来源。我们在观看这类宣传性画作时，观者很容易发现，这类画中“美”的表达一般都很直白，因而常常显得不免平庸乃至媚俗化。在可称之为“革命美学”的文艺“理念”指导下，当时的年画创作始终被一系列那时期特有的“概念”左右着，例如“高大全”，例如“三突出”等等。今天听到这些既遥远陌生又诘屈聱牙的“概念”之时，笔者总有会联想到当时同样流行的“最新最美”这个口号。

毋庸讳言，光是看到这个词，其本身就好像能透露出其构词基因中所隐含的时代气息。

说来，“最新最美”本是无伤大雅的，问题当然并非在于“最新最美”这个词汇，问题的所在，是这种表述所暗示的文化诉求，是一种明显功利且实用化的文化取向。百余年来，我们的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过于被自身特有的注重功利注重实用的价值观主导着，年画等艺术于是每每在“美学的扭曲”中迷失自我，而社会也因日益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变得“肤浅化”，这都造成“新文化”兴起以来愈趋严重的社会迷惘。

## 七、现实的囚徒

中国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有学者将之解释为中国世俗传统的过于强大。这是什么意思呢？通俗点讲，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在国人的文化取向中，罕有能执着地去面对、去追寻真相与真理的精神。同时，国人也往往刻意回避可能超越现实层面的思考。典型的如孔子所谓“未知生焉知死”“不语神怪力乱”“敬鬼神而远之”等等。因为中国文化罕见对真相和真理的追问和探索，也就难以获得穷追不舍地思考终极问题所能带来的精神超越。由此，国人便只限于生存在现实的层面。只相信现实，只看重现实和结果，那便只能是“现实的囚徒”。

因缺乏信仰的超越性而被牢牢囚禁于“现实层面”中的中国人，在遭遇现实的压力时，无法像西方人那样求助于神，求助于宗教所提供的“彼岸”予以缓冲，以为升华资源。在面临现实层面的困境之时，中国的传统采取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应对策略，我们的文化倾向于把困苦不断地转化为某种审美感动，因着这种应对的策略，国人便安于苦中作乐，安于不断地将遭遇的困境“审美化”，每以审美的方式逃避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对“新”的渴求、膜拜，以及对“美”的向往、期盼，在审视上世纪风行的现代年画之时随处可见，正是这些常年被人们忽视的世俗美术作品，向我们昭示了过于注重功利的中国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过程中，面对诸多困境、苦难之时，是如何倾向于“审美化策略”以逃避现实和各种矛盾的。

这究竟算是一种中国式智慧？抑或，它是一种思维的缺陷，是文化需要改进之不足？■

【述 往】

## 跪戕：张守良之死

郭小林

“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人人有权过他向往的幸福生活。”

——某国电影中律师的一句台词

张守良歿于1968年夏，时年二十二、三岁。只知道他原籍河北，根据他牙床颜色估计是河北任丘一带人氏，因为水土的关系，那儿的男人牙床多呈紫色。

大约是文革初期、1966年吧，张守良被安置到我们连，正好我们住的草房宿舍还有空位，就让他住进来了。他大约一米七八的个头，脸色发黑，很壮实，一看就是好劳力。我们聊得热火朝天他就听着，从不插话，听到有趣处就咧嘴憨憨地笑，露出两颗虎牙和紫药水色的牙床。

张守良其实和我的接触时间并不长，前后不到一年光景，后来他回老家娶了媳妇，带媳妇回来就分开单过，很快有了孩子。他是“清边”过来的。那时中苏关系紧张，靠近边境的地区就把认为不可靠的人向内迁移，我们农场距边境直线距离75公里，就安置到我们连农业排干活。他父亲是“劳改新生”即因“右派”问题被判劳改的刑满释放之人，那时候是要归入“地富反坏右”即“黑五类”之列的。刑满不让回原籍，就地就业。几年前他从河北农村投奔父亲而来，也被劳改农场吸收为临时工。其父亦被“清边”，但不允许父子在一起，就被安置在不同的连队。

文革一起，极左思潮泛滥，“阶级斗争”、“血统论”甚嚣尘上，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搞“早请示、晚汇报”、“三敬三祝”，“忆苦思甜”，天天晚上开会先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还吃了一次“忆苦饭”，麦麸子加豆饼熬成糊糊，一

人一碗，都嚥不下去，就偷偷倒了，白白糟蹋了很多猪饲料。

夺权、打派仗刚消停了一会儿，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又兴起了，各基层单位纷纷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代行被砸烂的公安机关职能，可谓权倾一时，那些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子弟背着枪（那时农场各连队为了“护秋”和防备狼熊什么的，都配备了少量步枪，晚上还有民兵荷枪巡逻的传统）、神气活现地大抓“阶级敌人”。作为成绩，当然抓出的敌人越多越好。

我那时因为摇唇鼓舌地为“炮轰派”（我们连的少数派）当吹鼓手，写了很多“打派仗”的东西，很伤大多数老职工的感情，所以到了“清队”运动一来，就被掌权的多数派抓起来，关进了托儿所，罪名是“‘三股妖风’黑干将、炮轰派黑笔杆子”。

文革以来生产陷于停顿，大家都不干活，老职工也不往托儿所送孩子了，托儿所遂成为关押“牛鬼蛇神”的临时监狱。一时间，因为各种“问题”被关进去的“敌人”有二十来个，凡是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均属历史有问题，朱站长曾是国民党军的军需下士；黄、汤两个副站长当过国民党骑兵的马术教官；郑副站长曾上过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军阶少校，只不过年龄大了，是个死老虎；王医生曾是国民党军的卫生兵，被俘后加入解放军，虽算不上真正的医生，但在我们连医务室干了十来年了，是个责任心强的、医德高尚的人，别的不说，我们连七百多口人，老职工及家属占五百，其中育龄妇女至少二百多吧，这么多的婴儿出生，几乎全是由他接到世上来的。本来他是有很高声望的，不知是怎么回事，借着这次运动，竟也给抓进来了……这样的占了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一些是所谓“出身不好”——真正的地主、富农是没有的，但“慰情聊胜无”吧，没有真地富，他们的儿子也算，哪怕捕风捉影也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所以像我们园艺排的孙阳武，出身其实是个上中农，因为得罪了排长，也给抓进来了。这样的也占了三分之一。

另外，平时爱说个牢骚怪话的、有男女关系问题的、小偷小摸问题的属于“坏人”、流氓，也抓了进来。我自恃出身好，坚信“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终究会照到这个角落”，所

以虽关在里边心里却很乐观，每天满不在乎，还和那个“乱搞男女关系”的唐姓青年嘻嘻哈哈的——其实还是靠“血统论”撑腰。

但别的人关在托儿所里却是心态各异：朱站长没了春风得意的劲头，一脸愁眉不展；邝浩泉早就有精神病，他被抓进来，照例一言不发；孙阳武每天面朝墙壁，流泪不止……

里面的人是这样，托儿所外面可吓坏了一个人。

作为运动，一定要造成浩大声势，所以连队的高音喇叭天天在那里喊“深挖”、“追穷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而且今天抓两个，明天抓三个，老职工多是农民，哪见过这个阵仗？那些出身有问题的人谁也不知哪天会轮到自己，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我是在托儿所里听到张守良的死讯的，据说那天他一夜未归，媳妇天亮醒来不见他的影子，心里发慌，就向连里报告。“群众专政指挥部”派一姓李的“老铁兵”和外号“小黑牛”的山东青年一块去找，找来找去找到连队住区最靠北的一排废弃的破草房，发现有一把破椅子摆在灶屋中央，上面还有新鲜的鞋印，怀疑张守良会不会躲在顶棚里，那会儿还没想到自杀的可能性，就找了一架木梯，一人扶着一人爬上顶棚，黑咕隆咚的，用手电一照，哇！赫然看到张守良跪在三角形的房梁下上吊了。大概死人的样子很可怕，离得又近，他们又没有精神准备，上面的人吓得大叫一声“有鬼！”，慌乱中一脚踩空，从梯子上摔下，砸到下面的人，两人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当时正值六月底，大批知青即“老三届”蜂拥而至，所谓“六一八批示”批准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已宣告成立，五十个北京知青刚到我们连没几天。“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人平时耀武扬威，这时却都“麻了爪”，谁也不敢上去把死尸弄下来，还是几个新来的男知青胆子大，自告奋勇钻进顶棚解开绳结，把张守良抬了下来。

张守良突然自杀，大家都觉意外：“咋也没咋的（读音地）他呀，怎么就上吊了呢？”而且跪着吊死，众人也很骇怪，身子没有离地，居然也能吊死！这死法，大家都没见过。他的班长高振波操着一口河南范县口音很惋惜地说：“张守良身大力不亏，干活不惜力（肯卖力气），平时少言寡语的，班里的人都很待见他。”

当时有人分析，张守良一个是因为出身问题，本来心里就有压力，又和郭小林住过一个屋，受郭蛊惑倾向于“炮轰派”，只不过碍于他的身份，“炮轰派”没要他。“炮轰派”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我等几个“炮轰派”骨干被抓，他就觉得大难临头：“连郭小林这样的都被抓！”他觉得下一个就会是他，于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睡不着觉……如此说来，我竟有点儿“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干系哪！

其实，我后来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他害怕，怕自己被抓连累了无辜的年轻媳妇和孩子。

至今我连他媳妇的姓名都不知，只知她长得还清秀，但来到我们连队与张守良过得并不愉快，生了一个娃娃之后，她整天唉声叹气、哭天抹泪的。估计她可能出身还不错，到了这里才知道嫁了一个出身不好的，觉得受了骗，更要命的是会跟着“吃挂落”；张守良回老家到邻近的县里找媳妇，大概也没敢讲自己是右派“劳改新生”的后代，如果讲了真话，恐怕没有女人会嫁给他。女方家里肯定会问到出身、成分之类，张也只好硬着头皮以“农场工人”搪塞过去，女方贪图彩礼也没有过多计较。这也是时下常说的“信息不对称”，几千里之隔，女方一听是国营农场农工，看男方年轻力壮、相貌周正，也就同意了。毕竟在关内农村，出身好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北大荒虽然偏远，起码吃得饱啊，还能挣钱！

那女子的家乡离北京不算远，北京文革初期那种“红色恐怖”、骇人听闻的大兴县集体屠杀“黑五类”的消息不会不有所耳闻，所以出身成分在那时成了攸关生死的非常严重问题。而我那时蜗居边陲草屋，信息反而不如张守良灵通。大兴、湖南道县、广西等地杀人事件一概不知。不过，这些毕竟只是猜测，关于张守良死因的秘密，大概是永远埋藏在那个女子的心里了。

高振波后来告诉我：张守良的媳妇在张死后带着孩子嫁到别的分场去了。他说，张守良回老家娶媳妇曾向他借了一百五十元钱（那时候这可不是小数目），高以为人死了，这钱也“死”了。没想到，他跟别人唠叨，不知怎的就传到那媳妇耳朵里，她还专门回了我们连一趟，把这笔钱还给了老高。■

初作于2009年冬，2016年4月14日—25日重写

【述 往】

##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九）

——上诉平反

王丕忠

### 文革结束

1976年秋季，有一天队部忽然宣布了一项惊雷般的消息：“毛主席逝世”。按理说毛泽东已属高龄，逝世本不足为奇。但是多年来大家喊惯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也从来没有听说他生过病，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无比健康、好像永远不会死的人。固然在受政治迫害者的看法中，他的健康长寿意味着千百万人的灾难，但对他去世的消息仍感到非常突然，甚至有人还怀疑这消息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以此来观察各人的反应，是对大家的又一次考验。历来这种情况已出现过多次。虽然这消息对犯人和农工来讲无疑是一则天大的喜讯，但是大家不敢流露出喜悦的表情，彼此间也闭口不谈此事。人人保持缄默，唯恐失言招祸。我当然也心中窃喜，我想他一死中国的情况必然要大变，变好的可能性大，变坏的可能性小。在他的独裁统治下，倒行逆施，为所欲为，终于闹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可谓登峰造极，亘古所未有。他死了以后，不至于会出现更坏的情况。

依我看，像毛泽东这样一个集阴险、毒辣、愚昧、专横、残暴于一身的人，世上少见。他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对民主、法治、人权这些现代人类文明的要素他非但不主张和支持，且横加打击和摧残。这三大要素是共和政体的基础，是他独裁统治的障碍。共产党掌权后，用清皇朝紫禁城的天安门作为国徽，这与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宗旨和形象都是极不适应的，对此我曾很不理解。后来想到毛泽东熟读史记和通鉴，封建帝王的意识极为浓厚，对历代帝王的遗物情有所钟，并以此象征自己身居帝位，大权独揽，驾驭天下。除此我找不到其他的解答了。

他死了可说是后继无人。果不出所料，不久以后就传出“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接着又传出文革结束的消息，再接着“四类分子”全部脱帽，恢复公民权。喜讯一个接一个，我感到心情舒畅，无比兴奋。

接着，又发生了与我切身有关的事，即政府和法院为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并号召当事人提出上诉。这是中共新领导班子拨乱反正的一项公正的政策。在毛泽东“四人帮”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从此，上诉的人和获得平反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我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起了波动。然而经过了一番考虑之后，我对是否要上诉犹豫起来。几十年来中共高层派系斗争激烈，互相攻讦，互斥对方为反革命，以至到底谁是反革命，什么是反革命，混淆不清。我是没有政治地位、没有政治作用和影响的平民，即使戴了一项是非不清、缘由不明的反革命帽子又有什么关系，不值得为此费心事去上诉。而且上诉如果被驳回反而会引起极大的不愉快。在劳改中我曾心拟了两句反动话：“宁作囚犯，不当顺民。”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我便放弃了上诉的打算。

## 上诉

几个月后，农场当局召开全体四类分子脱帽大会。接着我请假获准，几十年来头一次赴北京和家乡苏州去探访亲友。我遇到的人都鼓励我上诉，情恳意切，使我难以拒绝。同时我体会到在当时局势下，我的反革命前科注定了我的反革命分子身份，对亲友存在着不利的影响，上诉与否已不是关系到我个人的问题。

回到农场后，我开始作上诉准备。上诉须写出判决书的编号，以便原判法院或机关查考；又须写出内容，作为申辩的依据。可是判决书没有发给我，上诉无从动笔。于是向三中队队部查阅，那知不看倒罢，一看之后气得我要命。那份在队部存档的判决书与在监狱向我宣读的那两份不一样，以前的很简短，而这一份却很长，其中不无夸大而且添加了几件虚构的事，而且这份判决又从未向我宣读过，一直把我蒙在鼓里，真是岂有此理！由于

我过于气恼和激动，血压升高，头晕眼花，上诉状一时不能动笔。过了一个多星期，心情平静了下来，血压也恢复了正常。于是按这份判决书中所列各项逐项申辩。由于内容复杂，既有夸大又有虚构，写申辩很困难。写了好久，改了多次才写好。措词力求简明扼要，寄到原来判决的法院。约一个月后就接到回信，说上诉状已收到并已立案待办，叫我等待处理，不必催办。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法院既已接受了我的上诉，没有驳回，问题就有解决希望。果然不到一年，法院叫我去上海一趟，为什么去没有说。我料想事情已有眉目，不然不会叫我老远地去南方，于是我就匆匆赶去。到了上海，第二天一早便和我侄女一起去长宁区中级法院找我案件的经办人。他说我的上诉已复判，事情已经解决，某月某日开庭宣判，叫我出庭，并领取判决书。这下我高兴极了，盼望已久的事原以为要经过许多周折，想不到竟这样简单顺利地解决了。

## 平反

到了约定的日子，我便上法院去出庭听宣判。当时在法院附设的小法庭举行开庭仪式，参与者只有四人：办案人、书记员、我、我侄女。开庭后由办案人宣读两个文件：一是某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申诉人因反革命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某年某月某日以某字第某号决定书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现某某不服判决，提出申诉。经本院审查，原判适用法律不当。为此特裁令如下：一、撤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某字第某号判决；二、本案交区法院再审。”另一份是某某市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经某某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原判适用法律不当，于某年某月某日撤消原判，发交本院再审。现经本院再审，查明某某在解放初期，曾讲过一些错误言论，并非以反革命为目的，属思想教育问题。据此特判决如下：对某某宣告无罪。”

宣判完毕，办案人把这两文件交给了我。这时我忽然看见桌上有一张很大的团体照片是从我的档案袋中拿出来的。怎么我的档案中会有这样一张照片，感到诧异，顺手拿起来

看看。办案人见我看这张照片，随口问我：“你看看这里面有你没有？”我一听有些着急，因为我从未拍过这样十多人团体照，这是我能十分肯定的事，便说：“我从未拍过这样的团体照。里面怎会有我？我的档案中怎么会存入这张照片？这不是陷害么？”办案人顺手便把照片夺了过去，放入档案袋，并说：“我们也知道没有你在内，否则你的问题就大了，恐怕早被镇压了。”我说：“再让我看看行吗？上面印着什么字我没看清楚。”他说：“好啦，好啦，你已经平反了，问题解决了，还看它做什么？”说完后便走出门去了。想到这件事使我寒心。不过以我这案例来说，当局并没有利用这张作伪证的照片来虚构我这方面的罪行，可说是不公正中的公正。

在这次宣判时，办案人宣读了当初判我徒刑的判决书，只寥寥数语，比在监狱第一次对我的宣判还要简短。在宣判完毕后我问办案人为什么这判决书这样简短。他说这是最先的原始判决书。这样计算一下，我的判决书一共有四份：按顺序一是这次最后见到的原始判决书；二是在监狱第一次宣判的一份；三是第二次宣判的一份；四是在乌兰农场三中队存的最后一份。内容一份比一份复杂，这种情况可说是当时我国司法中的奇事，充分体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句话。

我平反后，被当地劳改局办的一所高中聘为英语教员。从此我脱离了农工队，从“二劳改”中解放出来，回到了社会。计算起来，我自1951年初被捕算起至此1981年为止正好三十年。

## 后 记

我写本文才开始不久，大约只写了五分之一，冬去春来，天气转暖，便暂时停顿下来，和家人亲友们一起去远途旅游，归途中在黄山脚下投宿。晚间在附近餐馆就餐，听到隔座一群青年人在谈，说是北京高校学生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口号是要求中共政权进行民主改革，惩办官倒，消除腐败，维护法纪，保障人权等等。据说参与者之众，规模之大，前

所未有。我和家人亲友等自离开杭州后一直在车船旅途劳顿和名胜古迹游览中过日子，既没看报纸也没听广播更没有看电视。对国内外的一切情况已睽隔多日。忽然听到这一惊人消息，我和家人亲友兴奋之极，平素一谈起国事便心情郁悒，满腹牢骚的情况，一扫而光。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等学校学生，既富热忱又有政治见解。洞察时弊，深恶专政制度，因而不顾得失，不怕迫害，甘冒风险来振臂高呼。把人们几十年来的夙怨和热望，大胆地公开地表达出来，令人感动和钦佩。

我回京后次日一早便乘公共汽车到公主坟车站，准备乘向东行的公共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眼看一看，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哪知东行的汽车因通不过天安门广场全部停驶，只好去改乘地铁。地铁站拥挤不堪，售票口前排成长队。好不容易挤上去，列车开行后在宣武门站、和平门站、前门站都不停，一直开到崇文门站才停下来。我赶快挤出车厢，挤出车站，穿过东长安街，拐入台基厂大街往西，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还未到达广场，在东交民巷的西头路口几十米处，便看到上万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进入广场后一看，人山人海，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场面，真是壮观。无数学校、工厂、企业和其他团体的队伍挤满了整个广场。旗帜交错，歌声嘹亮，再加无数扩音器中传出演讲声和口号声，交织在一起，欢腾鼎沸，无比热烈。同时秩序井然，并无混乱景象。广场中央地带，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支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帐篷，里面呆满人，这些是外地学校的学生或团体的成员来京参加学运的。我穿过人群走到地下通道。在出入口和通道两壁，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所有这一切口号、演讲、大小字报都是以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要求保障人权、要求法治、要求言论和新闻自由、要求惩办贪污腐败和官倒等等为中心内容，无不切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所以赢得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自不为怪。路旁成千上万的群众表示拥护，拍手叫好，我身临此景此情，不禁兴奋起来，也随着欢呼鼓掌。

时过中午，我自早晨七时出门，至此已达五小时，我顺着人行道上一股已形成的窄的人流，艰难地向西挤去，又挤了约一个小时才挤到六部口。游行的队伍和车队仍在源源不绝地向广场涌来。他们高举着旗帜和标语牌，一路走一路高呼口号，大街上呈现一片欢腾

热烈的气氛。我当时心情舒畅，兴高采烈，多年的积怨、愤慨、压抑、不满，想说而不敢说，即使敢说而无倾吐对象，即有倾吐对象也成不了气候，现在在这次运动中被广大学生、工人、教师 and 各类知识分子和群众公开地、无所顾忌地、不计得失后果地、不加保留地大声呼喊出来，全面彻底地表达出来，实在是大快人心，令人感到无比舒畅和激动。

参加游行的人数我无从估计正确，不过要在广大的天安门广场以及宽阔的东西长安街上挤满这么多的人，估计至少要有几十万人。当晚各广播电台报导说是超过百万人，我本人能躬逢和参与这次盛会，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可纪念的经历。当天回到家中已傍晚，疲劳之极，但精神愉快。

随后几天因受家人劝阻，我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只是在较近的三环路、白石桥、人民大学等地看大小字报和听消息。即使这些地方也是不计其数的人群。就在这时候，忽然从广播中和群众的传说传来了新消息，说是由于在运动中向共产党和政府提出的各项正义要求，当局不予理睬，学生进行绝食抗议，人数达几十人，并且不断在增多。我一听到这新情况，料想事态一定要急剧变化，按捺不住，次日乘家人不知，一早又去天安门广场。这次是从西直门乘地铁去崇文门，较上次顺利。一进入广场，只见情况有了变化。人群更为拥挤，帐篷增加不少。广场东西两侧新设立了许多临时厕所和供水站，马路上停着许多供水卡车和救护车，都是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医院为支持学运提供的。再往前走，走到各帐篷前便看到了绝食的学生们。他们分散在若干帐篷中，有的头缠白毛巾，有的身上写着口号，有的侧卧着正写东西。帐篷中放着面包咸菜等食物。前些天气骤降，群众捐助的衣被等整齐地叠放在帐篷旁边，因天气转暖，已用不着，但不归私人所有，集中存放。可见他们的纪律是很严格的。我在来此之前已听说广场中央竖起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于是继续走到金水桥南面地下通道的两个出入口中间，只见一座“民主女神”像矗立在围观的人群之中，大约有四五公尺高，是一个白色的临时塑像。塑像前有一面木牌，上面大意说到：自满清被推翻以来，名义上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实质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民主。全国人民无不渴望我国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改革，从人治转变为法制，使人权得到保障，法纪

得到维护，经济得到发展，全国人民才能从专政的桎梏下解脱出来，脱离贫穷落后，走向兴旺发达。为此在此地竖立起这“民主女神”像来表达全国人民的热望。但是现在政权还没有掌握在人民手中，这座神像早晚要被当权者拆除。然而人民早晚会掌握政权，专政制度的覆灭仅是个时间问题，这是世界局势的趋向，不论专政者如何挣扎，也挽救不了他们的命运，到那时候我们将在此原地，建立起一座高大的永久性的“民主女神”，永垂不朽，与世长存。我当时没有带笔和纸，未能抄下来。现在就所能记得的写下，与原文的措词当然不能相同，但主要的内容和精神不会有很大出入。

在部分学生开始绝食抗议后不几天，中共当局有了反应。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亲临天安门广场去慰问学生和劝阻绝食，并与学生代表对话。这一新情况表明当局所持的强硬立场有所转变。从这迹象来看，僵局有了转机、缓和以至冰释并非完全不可能。不料过不了两天，情况又急转直下，中共高层的强硬顽固派以莫须有罪名把赵紫阳撵下台，从而擅专军政大权，继而以惯用的高压手段来对付民主运动，宣布了戒严令，并从各地调动部队来北京执行戒严，旨在扼杀民主运动。

顿时首都全市陷入赤色恐怖之中。可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和群众中的运动积极参加者并不胆怯，并不气馁，同心协力地在通往郊区的交通要道口设置了各种路障，以阻挡戒严部队开进市区。我家正当通往西郊的要冲，西三环中路与紫竹院路的交叉路口设置了电车公共汽车，供学生工人人们的纠察队在看守路口任务中作休息场所，路口一带人群彻夜不散。

事件当夜我正在酣睡中，忽被窗外传来的枪声惊醒，心觉有异，急忙起床与家人凭窗谛听。我家在高楼第十层，卧室面南。当时夜深人静，又是居高临下，枪声清晰可闻。估计枪声是从东南方向传来。起初稀疏，后来渐密，继而成为连续的机枪声，其中夹杂着隆隆声和汽车急驰声。我们十分惊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政府既已宣布了戒严，按当时局势估计是政府在用武力镇压学生，肯定是，不会错，想象中不可能发生的事竟会发生。枪声持续了几个小时，到拂晓时由疏而止。镇压遂告“胜利”完成。这“胜利”是必然的，

因为对手是手无寸铁的学生、知识分子、群众和工人。他们只有被杀，绝无还手甚至自卫的能力。我当时怒火中烧，无法再入睡，胡乱吃了些东西，天已大亮，便外出观望情况。其时街头巷尾已有不少人三五成群地在谈论夜间发生的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晚听了外国电台的广播，也听了北京当局发布的报导，二者关于这次事件中死伤人数的统计数字相差很远。从我亲自听到的枪声之密、持续之久来估计，死伤人数一定不在少数。然而确实的数字，即便接近的数字，外界也无从得知。

随后几天中，国内广播和电视台每天长时间地播放所谓“反革命暴乱”的真相和平定“暴乱”的经过。政府发言人的报导无非是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谎言，有些话是欲盖弥彰，骗人达到自知骗不了人的程度，可是还不得不骗下去。

关于学运，还有一情况应该提及。这次民主运动是按我国宪法中人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的规定进行的，规模宏大，人数众多，群情激昂，气氛热烈，可是秩序良好，出乎意外。参加者遵守纪律，没有越轨行动，这是有目共睹，一致公认的。在运动后期，我几乎每天外出，在游行人群中走动观望，没有见到或听到吵闹、打架或其他纠纷等事。人际关系，空前友好。据很多人说：自运动开始以后，社会上窃盗、抢劫、伤害、凶杀等犯罪事件，从未发生。依我看不会有那样绝对，但至少要比平时大大减少，这个奇妙现象，原因不明，即强加解释，也难以求证。不过民主运动中秩序良好，没有混乱，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要说“暴乱”，只有武装部队用坦克和机枪屠杀学生和群众的暴力行为。手无寸铁甚至连木棍或石块也没有的徒手平民是决无挑起暴乱的企图和可能的。

事件发生之后，我因精神受的刺激太大，心情极度恶劣，无法安心执笔。本文不得不中途停顿下来。

思绪混乱地挨过三个多月后，我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身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自应负起应尽的责任。不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而是自己应积极行动，有所作为，尤其是处于逆境时更不可沮丧消沉。我是书生，又已年迈，但在迫切的愿望推动下，仍可利用拙笔与专政制度展开斗争，以亲身的经历揭露我国政治阴暗面中的

一个死角，对民主运动多少能起一些作用。这些想法鼓励我把原已搁置，甚至打算放弃的本文继续写下去。于是整理旧稿，重新构思执笔，以抵于成，深切盼望它日后能见于世。至于本人将会因此招致什么厄运，不加考虑。只要能能为民主运动尽一份力量就是我莫大的欣慰，也是我平凡而坎坷的一生中所作唯一有意义的事。

我在大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回忆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那次运动振奋民心激发士气，对抗日战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次民主运动，无论在规模、时间、意义、影响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一二·九运动。后人对这场运动在宏观上的论述，诸如起因、影响、后果等等，肯定不会少。但在微观上的具体情况和细节的记载，可能不多以至失传。但这是决不可缺漏的，因为它有感动人而引起同情和愤慨的效果。我既曾身临其境，又正当我写本文期间，我就把当时身经目睹的情节从详写入此段后记中，使其成为全文不可分割的主要内容。我由衷地迫切地渴望人治的专政制度将让位给法治的民主制度，从而在世界上永远消灭，永远不再出现，并且深信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逆转。

## 补 遗

有一个方面，本文没有提到，毛泽东所提倡并迫使公职人员以至全国人民必须遵行的大义灭亲，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号召，强制人民只能倾向共产党，忠于毛主席，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允许存在私人感情，即使家人和亲友间也不例外。关于这些，我在农工队遇到的一件事略能说明问题。情况如下：

大约是1978年，当时我在内蒙东部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劳改农场那家卧铺农工生产队务农，种植水稻。有一天放假，我有事去大约40公里外的乌塔旗镇。当我到达车站时，车虽未开但已满座，我只好站着。碰巧在车上遇见同队的另一农工，他已有座位，他的姓名已想不起来，只知他是广东人，年龄比我小，中等身材，眉清目秀，风度翩翩，一眼就可看出是知识分子并有相当身份。他见到我便向我打招呼，并起立让座，我再三推辞，他

坚持要我坐。相谈之下，知道他是原国民党政府时的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由于职务关系被判刑劳改，这次去乌塔旗镇是去医院看病。不一会到达目的地，便各自下车分散。那段车程不过半小时，因路况不好，车子颠簸，一路站着也很不好受。我很后悔，不应该让他站着，何况他还是病人。我年龄虽比他大，但身体却比他强。当时只顾交谈，没有想到这一点。由于他知礼谦让，是有教养的人，我不免对他发生好感，在随后的日子里和他交往较多。农工们都是无钱无势的穷光蛋，都是被践踏到社会最底层的人，谁对谁好或接近，绝不存在任何目的和企图，纯粹出于真诚的友善和好感。他的外表虽不错，但气色很差，面色发灰，这是内病严重的象征，果然过了不久他便去世。

事隔不久，有一天农工队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十岁多的女孩。她衣着朴素整洁，举止文雅，原来是那死者广东人的离了婚的前妻，女孩是他亲生女儿。据她说从死者的家人处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从迢迢五千里外赶来扫墓，并想领走他的骨灰。那时农工死后，尸体是在扎旗郊外一所很大的焚尸所焚烧的，骨灰装在瓦罐中埋掉。她是否领到骨灰我不得而知，我与她只见了一面，因为我要出工劳动，没有机会再相见。在她初到时与几个农工和我简短的谈话中，谈到她与丈夫离婚，并非出于自愿，实在是迫不得已。她工作的单位称她丈夫是阶级敌人，她如不与他离婚划清界限，单位便不能再留她继续工作。那年代全国所有的人除工资外不可能有其他收入，失去工作便无法生活。她别无选择，只好同意离婚。打算在他刑满后或政治环境变迁后再复婚，哪知等不到那时，他便死了。那妇女说她从他家人处得知，他的发病始自她提出离婚后不久，所以他的死是受了离婚的影响，说时痛哭流涕，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这件事看来不是件大事，表面上看不出政治运动中那种暴行。而且借用一句古谚“大义灭亲”，好像还有些道理，蒙蔽性很大，因此很少人意识到这点而提出异议。然而仅以我所处狭小范围内既有此例，以全国来讲，这一强制性的号召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六亲不认，互相攻讦的悲惨局面，影响所及的个人和家庭之多，难以估计。这种灾难，中外古今所未有。

这件事虽不是我本人的事，但它引发我莫大的伤感和对死者及其妻女的同情。是我在劳改中思想和感情方面的痛苦经历之一。因此作为“补遗”，载入“纪实”。■

小记：本书写完之后，大约在1991年，继父给我几页纸的“补遗”，让我加到书里。说这是一件让他非常难过的事。这段“补遗”没有故事，无所谓情节，仅仅是一个接触不多的难友，一个不幸的没有等到丈夫的妇人。笔触一如全书，平实、克制、客观，但强烈的同情与悲愤呼之欲出！

高忆陵

## 附录一

### 波叔与我们一家

王孝基（王丕忠侄女）

波叔是父亲的胞弟，同属虎，小我父亲12岁，因为出生时正值一次大战开战，故小名欧波。



我父亲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叔祖是晚清著名学者王同愈；祖父是王同愈的胞兄王同懋，也就是原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的外祖父。我的祖父王怀份（念 bin）留学英国回来，从事外交工作，与司徒雷登交往甚密。父亲和波叔小时候是司徒雷登寓所的常客。1996年夏天，82岁的波叔曾带我去如今的北京西山八大处，寻找当年与司徒雷登聚会的场所。半个多世纪过去，他居然凭着（少年时期的王丕忠）门前的树木还能认出那破败木屋就是他曾经居住玩耍过的地方。

我小时候没见过波叔，是波叔平反回上海后才第一次见到。从父亲口中了解到：祖父家教极严，父亲从小胆小老实，祖父音量略高，马上乖乖闭嘴。波叔则只要他认为对的，就会据理力争，因此没少受皮肉之苦。祖父却常常背后称赞波叔：“刚正不阿，有出息！”确实，波叔燕京大学毕业工作后，赡养父母，接济兄长，一家人其乐融融。



可是1951年1月份的一天，波叔突然失踪了。家人怎么努力也打听不到下落，大家心急如焚，束手无策。祖母极度思儿，寝食难安，病体每况愈下，不久便故世了。她临终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喃喃呼唤：“欧波快点回来，欧波。”无论父母亲怎么安慰她，（王丕忠之母）没能见上小儿子最后一面，老太太最终口眼未闭。



我出生前夕，祖父也故世了。忙于奔丧的母亲早产且难产，我被产钳拉到了这个世上，那年是1953年，父亲51岁，母亲41岁。我印象中的祖父是父亲与波叔描述的：一位博学多才、严肃正直、对社会有贡献的外交人才，从政经商皆游刃有余。曾与德国人合伙在旧金山开铜矿，不料遭遇马克贬值，投资失败，家境一落千丈。无奈，祖父进了汪伪政府工作，担任公债司司长（王丕忠之父）。解放后也因此进了共产党监狱。但祖父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任职期间没干过任何损害国家和人民的事，还据理力争反对汪精卫发行公债，为老百姓免除了一场苦难，为自己免除了死刑，几次获准保外就医。可是监狱通知祖父病死，父母亲为他草草下葬时，薄皮棺材的缝隙里还滴着血水，怎么会有血水滴出？当时谁也不敢问，至今成谜。

我父亲王敬忠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尤擅英语，毕业即留校任教。以后曾在多家外事部门当翻译，诸如英国海军驻南京武官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解放后则在中国

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当笔译。

解放前的工作经历使他获得了“历史反革命”帽子，历次运动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他都是运动的重点。



有一年（我太小，实在记不起），家里收到一张内容简短的

明信片，才粗略知道波叔犯罪判刑，在东北某劳改农场服刑，希望能寄给他老花眼镜、套鞋、油布什么的。我是浑然不懂，母亲虽有思想准备，还是免不了一惊。父亲经受了太多打击，在波叔失踪的问题上脑子出了岔，精神彻底崩溃，随后被单位辞退，只发给微薄的生活费。他始终认为波叔去了香港，后又去了美国，总有一天会回来接

他。（王孝基与父亲在一起）在他的世界里原话是：“报纸登的香港九龙大火，烧毁了200多间木头房子，其实就是暗示我，欧波平安到达香港；平民小人全部烧死，就表示欧波很安全，不会被小人陷害。”“一辆A06牌照的轿车，在我面前停了两次，我晓得A就是America、0就是欧波、6就是快乐，他是要告诉我，欧波在美国很快乐”……

母亲只得带他去就医，三次住院。一次住复兴西路21号上海市立精神病医院，两次住谨记路600号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总共住院大约有一年半时间。学龄前的我，于是有了每月与母亲同去医院探望父亲的经历。

幸好父亲仅仅是在触及时事和政治问题时，脑子会发生混乱，会按他自己的思维和信念说一些“疯话”。而在生活中他完全不糊涂。父亲的知识面极广，我的学业一直由他辅导，尤其是英语，使我在班级能一直名列前茅。他讲给我听好多古今中外名人名言、趣闻轶事、成语典故出处等，让我受益匪浅。乃至1998年作为工薪阶层的丈夫和我，倾囊购买了三房一厅，也得益于父亲关于不动产的理念。

母亲宋桂芬出生于苏州修仙巷（后改为绣线巷）宋家，也算是当时的名门望族。祖上

宋骏业是康熙朝的兵部左侍郎，善于书画，故康熙委其主持绘制《康熙南巡图》。骏业延请时年60岁的王翬和宫廷内外的多名高手，历时五年，绘就12卷，现8卷分藏于海内外，4卷下落不明。骏业亲自绘制了南巡途中从无锡至苏州的山水、民居、城垣、店铺、舟桥、良田的粉本（全图纵0.65米，横29.55米）。2002年，母亲堂弟宋湛谦代表宋氏家族，在南京博物院举行了捐赠仪式，将粉本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完成了先人“敬守之”的心愿。

原修仙巷宋宅有七进，东宅西院。东大厅高悬康熙御题“静永堂”匾，西花院取名“趣园”。解放后园中的“八角亭”捐献老兄弟给国家，移至现今留园；“花篮楼”也捐献了，移至寒山寺，就是现今的“枫江第一楼”。

现在，人们可以用正常的心态看待母亲这样的家族，可当时母亲的成分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的地主，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再加上波叔是现行反革命，可想而知我家文革前后有多艰难。



（王孝基之母宋桂芬结婚照）

波叔的来信很少，一年大概也就一封，每次母亲都关上门窗偷偷地看，既割舍不下蒙难的胞弟，又担心被人知道和“服刑期反革命”联络会有危险。母亲是深度近视眼，矫正视力不到0.1，所以在我学会写信之前，基本上都是央请波叔的挚友王恩济叔叔（上海医药研究院高工）代写回信。

1963年是我们家的春天：父亲结束了第三次住院，回到家中。波叔刑满释放，虽然换汤不换药，依旧没有自由，继续在农场艰苦劳动，但母亲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

那几年刚渡过困难时期，物资贫乏、粮食缺少的状况稍有改变。我每顿都能吃饱，偶尔有鱼、肉，也基本上都是我享用。父母竭尽所能呵护我，使我没怎么感到生活的艰苦。等我长大懂事后，每每想到这些，心口隐隐作痛。睡梦中无数次梦见父母，梦境总是两种情形：要么是非常开心，给父母好多零花钱或带父母去吃西餐；要么是非常伤心，父母生

活窘迫或生病而我无能为力。

相对平静了二三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批斗，扣上假精神病真反革命帽子，说装精神病就是为从事反革命活动做掩护，为此遭受了一系列非人的折磨。可怜的父亲经不起新的刺激，走进他个人世界的时间又多了，回到现实生活的时间少了。

母亲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检查结果：卵巢癌中晚期！这个晴天霹雳把我吓哭了。医生安慰我：“不要急，不要告诉病人，还能手术治疗。”一边填写住院单一边问我些基本信息，我没加思索一一作答。问到家庭成分时，我同样没加思索轻声回答：“反革命。”瞬间情况逆转，医生撕了填写到一半的住院单，把病历卡推回我面前：“走吧，医院不为“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及家属治病。”脑子里轰的一声我懵了，我苦苦哀求医生救我妈妈，医生只是草草开了些止血、止疼药片，打发我们走了。

是我害了母亲？分明是我害了母亲！不是吗？！我无声地哭，无声地喊，胸口不时阵阵抽痛。我错在哪里？错在说了真话？如果父亲真是反革命？我怎么丝毫察觉不到他的反革命行动呢？母亲的病怎么办？我试着婉转地把母亲的病情告诉父亲，父亲听明白了，可是他不相信，说现在到处说假话，医生也在说假话。

看来只能换家医院试试，我对自己说：“绝对不能说真话”。编好了词，隐瞒了长征医院求诊经历，带母亲去了第一妇婴保健院，重新检查的结果是卵巢癌晚期。当医生知道我们是“工人家属，父亲工伤在家不能前来”时，尽力进行了救治。

几天后公用电话送来传呼：“明天上午准备200元，带上生活用品来第一妇婴保健院。”第二天院里派了一名医生一名工宣队员陪我们一起去肿瘤医院，当场就收治入院。

母亲奔波治病拖了些日子，营养太差体质太弱，不能马上手术，需要调养几天。可是没过几天，母亲的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大量腹水，肚子涨得比足月孕妇还大，失去了手术机会，只能姑息性治疗。三个月后，她恋恋不舍地看着我，慢慢闭上了眼睛。在龙华殡仪馆最后告别时，没有一位亲戚到场。来了几位邻居和十几位同学，因无钱租厅，就在殡仪馆的过道上匆匆向遗体告别。我哭得死去活来，连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都为之动容，劝我：

“回去吧，还有老爹（白发苍苍的父亲被他们看成老爹，也就是爷爷）需要你照料啊！”简单送走了母亲，从此，我一边上学一边全面操持起家庭生计。那年我16岁。

毛泽东“12.21最新指示”后，上山下乡之风越刮越猛。68.69届的应届毕业生干脆“一



片红”，全部务农。像我们这样的反革命家庭更别无选择。当时因妈妈生病借了父亲单位的钱，每月必须从他微薄的退休工资中扣除，所剩下的钱很难维持父亲和我的生活。我决定自食其力，从学校提供的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等地中，选择去安徽插队落户，为的是离父亲近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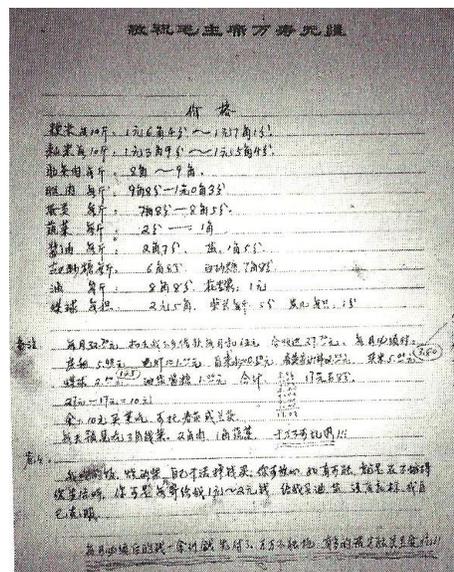
在学校下乡劳动时我曾结识一位“右派”老医生，我们很聊得来。他教了我很多医学知识，我还曾去过他供职的医院，帮他抄药方。

（下乡插队前的王孝基）插队到安徽怀远后被分到徐圩公社新集大队，新集大队有一个当时全公社最大的卫生院，中西药较齐全，医务人员缺少。于是在我下乡后没多久，就当上了一名“赤脚医生”，相对于下地劳动舒适了不少。

那时我心事重重，默默寡语，怀念母亲，惦念父亲，想念波叔。心想我命怎么这么苦，就没一个成分好一点的亲人能帮帮我。我又是独苗，没有兄弟姐妹，真是孤独啊，心苦啊！

更苦的是父亲，他年迈多病，经常饿一顿饱一顿。由于欠了几个月房租，房管部门逼迫他搬出住了二十几年的小屋，搬到一间木板钉的不足10平米的泥地破屋。但他竟奇迹般的一个人生活下来了。学会了买菜做饭，

每个月严格按照我走时留下的表格开支。只是（王孝基下乡前留给老父的“每月开支表”）



本来清瘦的父亲更加瘦了。年底我回上海探亲，父亲那个高兴啊，用省下的钱买了一两他最喜欢吃的巧克力回来，自己一口不吃，笑眯眯看着我吃。西餐奶油蛋糕巧克力是父亲的



最爱，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东西就再也没有进过家门。然而祸不单行，我在卫生院护理危重病人时不幸染上了急性肝炎，提前回到上海，住进了医院隔离病房。每周两次探视父亲必来，每次都会买一个奶油面包给我。记得有一次他带着歉意的笑，说：“少给你一点，我掰一小半吃”……

就这样，为了和父亲相依为命，我肝炎病愈出院后没再去安徽。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没有钱，不可能有工作。我

（1970年下乡插队时的王孝基）寻思可以做佣人，也就是现在的钟点工。我们楼下邻居身体不好，二个外孙年龄小需要照看，所以雇佣了我。我的任务是早上刷马桶，上午买菜生煤炉做饭，下午帮小孩洗澡、洗衣服，然后拖地板，等她女儿女婿回家后我就下班。另外我还在里弄给4家洗刷马桶，每家每月挣1.5元。这样每月总共有16元收入，和当时学徒工资差不多了。

1972年底，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后，情况有些好转，独生子女可以停止务农返回原籍。我遂于1973年将户口迁回了上海，并安排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厂工作，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从1963年我学会写信开始，一直和波叔有通信往来。生活有着落后，我多次写信希望波叔能回上海探亲，一方面我们从未见过面，一方面想父亲和胞弟见了面，也许能帮助他走出个人世界。



然而波叔没被批准探亲，只是寄来一张一寸黑白照片。父亲凝视照片许久说：“共产党厉害，居然找到如（王丕忠与好友王恩济）

此相像的人来骗我，但我还是看出破绽：为什么要戴大帽子，肯定脸像头发不像！”“有本事让人站到我面前给我看，否则绝不相信。”

父亲长期罹患肺结核，曾因气胸住院二次，加上常年营养不良，由肺源性心脏病导致心力衰竭，1975年底与世长辞，兄弟相见的心愿最终未能了却。

波叔更加不幸：高寒荒僻地带劳改12年，“二劳改”18年，没自由没尊严漫长的30年！



我曾多次写信让波叔提出申诉，波叔以年代久远无法复查、不予理睬等回复我。看了《镇反沉冤：我的劳改三十年》才知道，是30年的冤气堆积使他认定，被视为暴政的敌人比做它的顺民还强。他在书中写道：“由于案情简单，又无同案，看来法院复查并不费事，因此在上诉只一年多便经复判，宣告无罪，12年徒刑的冤

案（1994年王丕忠与夫人庞曾漱在家中）遂告平反。”波叔他不知道，

波叔一生中唯一的幸运，是遇见了早年就相识的庞曾漱。当时拨乱反正，大举办理冤假错案平反工作，但波叔的案子年代久远，是经过法院正式宣判并服刑期满的，没人愿接手这个案子。有关部门的人对后来成为我的婶婶的庞曾漱说：“要想平反，除非找到当年的办案人！”婶婶不言放弃，她想方设法，顺藤摸瓜，几经周折，终于奇迹般地找到了当年的办案人。然后找熟人托关系，动用了好多人脉，再由我去见面、办些具体事宜。比如找过位高权重的×××，找第一律师事务所的××等，光长宁区法院我就去了好多次，王恩济叔叔也帮过忙。波叔说的一年多，其实是婶婶费尽心血的一年多，是我紧张忙碌的一年多。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婶婶的费尽心血及我等的努力，波叔就没有平反的可能。

波叔平反回上海后住在我家，我已结婚，由于住房条件限制，波叔只能住阁楼。婶婶

把波叔接到北京，结为夫妇共同生活。他们一同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一同去各地旅游，波叔终于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1997年，一生为别人忙碌的婶婶不幸患肝癌，先波叔而去，把一个倾注一辈子心血的温暖的家留给了波叔。但是，波叔的生活并没多大变化，因为波叔的女儿、我的姐姐们像婶婶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波叔，使他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我有一个好丈夫，我和他共同幸福生活了22年。1998年底我们买了新房子，可他仅在新房子住了一个月，胰腺癌就无情地将他带走了……

生活还要继续呀……我擦干泪咬咬牙挺过来了。2003年我的儿子结婚，2004年我有了小孙子，现在一切又开始好起来了。

退休后我去学习了国画，又学了布艺堆画，这两年一边做画一边在社区活动中心当指导老师。我的作品基本上都被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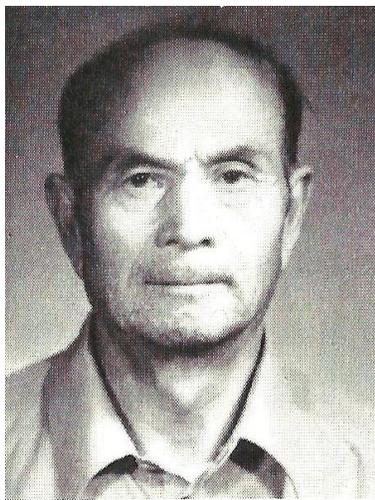
部队收购了，使我很有成就感、(2014年王丕忠与侄女王孝基(左)、继女高忆陵在一起)很开心。现在正打算组织更多有富裕时间的人员学习布艺堆画，开发新品种，早日实现布艺堆画作品的商品化。

波叔于古稀之年毅然写下了十几万字的《镇反沉冤：我的劳改三十年》，惊讶之余，我大感敬佩。他的苦难不是孤立的，必然波及到家庭和亲人。我惴惴写出如上文字，不知是否补充了这方面的情况。波叔说他的文字是“历史的见证”，我的文字算不算“见证的见证”？ ■

## 附录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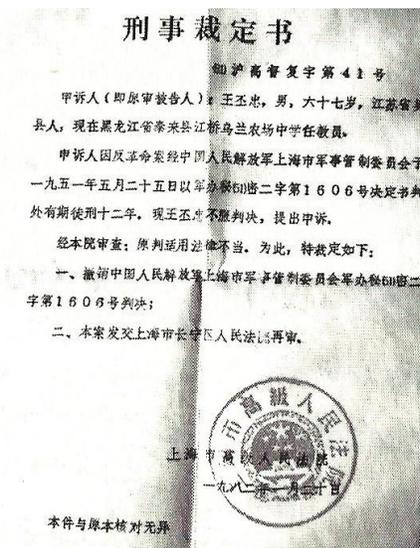
## 继父其人

高忆陵（王丕忠继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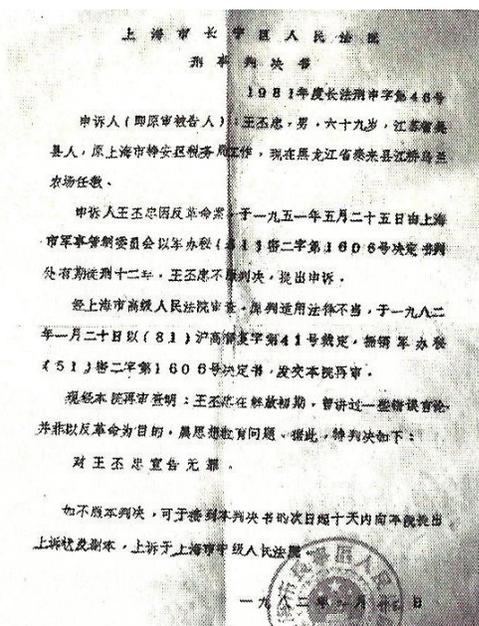
我的继父王丕忠（欧波）生于1914年10月，江苏苏州人。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9年上海解放后属于旧政权留用人员。由于不堪忍受新政权对他们这类人的歧视、猜忌，想离开大陆去香港投奔亲友和谋生，不料却在1951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简称“镇反”）运动中被专政机关诬陷为“国民党匪特”而遭冤狱。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十二年徒刑期满后仍然不能获得自由，而要“自愿”申请“留场就业”，继续过着“二劳改”生活，“反革命”帽子一戴就是30年……

（1981年，结束劳改的王丕忠）记得是在1981年，离婚后的母亲，向我们介绍了王伯伯的悲惨经历，引起我们极大的同情，从此，这位王伯伯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母亲与王伯伯是同乡和远亲，早年就相识。母亲坚信他是好人，决心为他平反冤案。母亲不辞辛苦地在内蒙偏僻小镇和上海之间奔波，遇到再大的阻力也不言放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找到当年的办案人，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下面找到王伯伯的案卷。经法院重新裁定，宣告王伯伯无罪。若不是母亲一腔正义，行事果决，王伯伯很可能在内蒙高寒地区教书至退休老去，也许就不会有这本书了。写到这里，我深深怀念在1997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被恶疾夺去生命的母亲。



母亲考虑到王伯伯平反后没有一个合适的生活地点，决定把他接到北京共同生活。1983年，继父与我母亲结婚后，兴致勃勃地投入新生活。母亲一直努力使继父晚年幸福一些，多多少少补偿一些他失去的东西。他们参加了《大英百科全书》的部分编译工作，还不取分文地帮社科院翻译国外的书籍，一起去高校和科研院所辅导英文，给文革后那批求知若渴的年轻人留下了“气质高贵”，“特有教养”，“发音特纯正”等深刻印象。一有闲暇，他们就去旅游和探亲访友，九寨沟、张家界、苏杭一带、大海边……都留下他们的足迹。继父在90多岁后曾深情地对我说：“跟你妈妈在一起的14年，过得真好啊！”

书中提到，继父判刑后不知是谁给他寄来一个包裹，给深陷囹圄的他带来一丝人间的温暖。继父平反之后才知道，寄包裹的女性是我的二姨，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性情豁达的人。当年她得知继父及他家庭的不幸遭遇后，完全不顾自己会招惹麻烦受到牵连，果断地出手相助，不仅花钱购置了生活用品，还到监狱门口去排了很长时间的队。1999年我在美国见到二姨，提起这事，觉得她的行动十分难得，她淡然地笑笑：“没有什么，那时只有我能帮这个忙了。”



跟继父生活在一起，他很少提过去的事情，偶尔提两句却使我吃惊。他认识我不久，曾问我：“你知道1951年的‘四·二七大屠杀’吗？”我脑子里迅速搜遍所有教科书给我的知识，都找不到这件事。“当时监狱院子里枪毙的人都堆不下了。”他说：“我身边死的人太多了……大部分都是教授、律师、职员、医生这类的人。”

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我还小，直到60多年后，我才从《炎黄春秋》杂志上得知真相。毛泽东1951年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局部) 3月18日在一份批示中写道：

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sup>1</sup>

在伟大领袖“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下，“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3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sup>2</sup>

我这才知道，“大屠杀”并非空穴来风！

作为镇反对象又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劳改，人们不免会对他提出疑问：“为什么你能活下来呢？”他的解释居然是：“我的饭量小。”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说就像鱼能游，鸟能飞一样，自己天生耐饥寒的能力比较强。

察，除了生理上有一定条件，他的性格即心理条件也是帮他度过非人苦难的重要因素。他的性格特点可以形容为“有信念”的性格。由于有信念，他对周围的人有爱，有憎，有同情；在非人的环境中能熬，能忍，能等待；对自己，不失尊严的底线，例如文中描述他绝不趴到地上去抢喝那点粥汤；对别人，能感同身受地寄予同情，不作加害于人的事。在生与死常常处在临界状态的严酷环境中，人的内在精神力量好比一种抵抗力，使人克服恐惧，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保全生命。继父在脱离劳改过上平静安逸的生活后，我与他相处30多年，常常能感受到他稳定的精神状态、善良悲悯的心性、睿智的处世哲学，这都是精神上的“抵抗力”，不仅使他能度过鬼门关，还使他安然达到百岁高寿。2002年，88岁的他给我一封“写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信的大意是：

<sup>1</sup> 尹曙生：《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第3页。

<sup>2</sup> 同上。

我国现有商场、超市和百货公司等地，售货员在工作时间只许站立，不许坐下，……售货员每天站立八小时或以上，即使生意清淡甚至没有顾客时也必须干站。我曾几次坐火车没有座位，站立一二小时便难以忍受，售货员要站八小时甚至更久，我真不知他们怎样坚持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虐待……我建议商场、超市和百货公司等为售货员设立座位，只需高脚小圆凳，只能作为歇脚，无法倚靠或打盹（以免影响生意）。在生意清淡或没有顾客时可稍坐休息，免得遭罪……

信尾的落款是“北京市民王丕忠，2002.3.6”。他执意要我把此信寄到国务院办公厅，我照办了。当然，此后音信全无。他的建议在有些人眼里也许是可笑的“认死理”，“脱离现实”，在他却是自然流露，天经地义，而且十分执着。细想一下，是他的理死，还是我们的心死？是不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感觉别人痛苦的能力？



（王丕忠与夫人庞曾漱在公园中）

不知哪年跟他聊天，他说，劳改中最好的一段时光是让他到池塘放鸭子。“除了我和鸭子，什么人也没有，小青蛙看见我就跳出来，我还可以摸它的脑袋呢！”这简直是一幅田园图画：小池塘边，一个孤寂的劳改犯，温情地抚摸着陪伴他的小青蛙的头。在苦难生涯中依然保持着爱的能力，这个人的生命力能不强么？

前两年，我给他买了一对鹦鹉。没过多久，他就把鹦鹉放出来，让它们自由自在满屋子飞，不时停在窗帘杆和吊灯上，晚上再飞回笼子里。这是他老人家特殊的养鸟方法，也许是不忍心看着小生命被囚禁吧。小区院里的流浪猫们没少吃他买的猫粮，年事渐高的他活动范围逐渐变小，每天坐在楼门前看猫是他的一大乐趣。我每次经过，他都要像介绍某个人似的，郑重告诉我：“这只猫认识我。”

年届百岁的继父常常引起人们研究“长寿秘诀”的兴趣。走进他的房间，床旁枕边堆满报纸杂志，时尚杂志上的众多美女朝你搔首弄姿。孩子们总结说：“爷爷爱看大美女，所以活得长。”其实，爷爷岂止喜欢美女，他还酷爱石头，曾被叫做“石头爷爷”。家里地上、桌上、柜上、架上堆满了他的石头，你要是不小心进了我们家门，就会被爷爷拖住，一块接一块地介绍他的石头，让你无法脱身。相对于收藏名石，他更喜欢在自然山水中寻觅觅，下过雨的河滩是他的最爱，因为一切石头都被雨水冲刷出本来的颜色。年届高龄之后，对石头的热爱使他成了潘家园市场的常客，虽然是从北京西北到东南的大吊角，他每周必去一趟，还总是说：“潘家园，很近啊。”老人家身体真是好，有一次我送他到木樨地坐车，他居然跑步去追 52 路，那时，他 94 岁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数码相机发生兴趣，频繁出入于海龙、鼎好这些电子产品大卖场，接二连三地买相机送给亲友和学生，床头的时尚杂志一度被《数码科技》所取代。每次买回新相机，他都要告诉我们这个相机有什么不可取代的优点。有一次，优点是“有根带子，可以挂在脖子上。”真让我们哭笑不得。他爱说：“我在商场有朋友。”言外之意是可以买到好东西。他把“朋友”卖给他的相机给我看，上面有明显的划痕，显然是以次充好，看来他的“朋友”不懂“童叟无欺”的商业信条，不过，看着老人的兴奋劲儿，谁

也没捅破这层窗户纸。

除了喜爱小动物和照相机，他对汽车更是入迷，只是由于年龄关系，没办法把汽车搞到家里……可以说，他的长寿秘诀应该有一条——“总对某件事物感兴趣。”，而且，这还仅是秘诀之一。

众多秘诀中，他曾说过的“我忘记年龄。”恐怕也是颇为重要的一条。老人家不仅心地善良，而且颇有教养，彬彬有礼。九十多岁高龄的他，只要看见我提着重物，一定会伸出手来要接过去。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却没忘记自己是位 Gentleman（绅士）。家里来了客人，他总是忙着接站、送站。虽说他的参与非但帮不上忙还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但我们非常尊重他把自己定位于帮助别人的人这种想法。

他尊重身边所有的人，无论保姆、电梯工、清洁工、卖报纸的、送报纸的……几十年了，报亭、超市、自行车摊，人都换了一茬子了，提起他来，所有的人异口同声：他可真是个好老头！

我之所以要写继父的生活琐事和以上方方面面，是想让读这本书的人知道，书中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善良、无辜的知识分子，却陷入三十年的冤狱，而且不容申辩……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如此欺负一个柔弱的普通公民，公正何在？！

继父的冤狱绝非他个人的苦难，如果没有这十几万字，他经历过的漫长黑暗的日子将随着当事人全体逝去而永远无人知晓。现在，有了这本书，我们可以“立此存照”了。

几年前他的文字在国外网站发布后，网友们的回馈温暖着老爷子的心：

- ❖ 谢谢王老爷子写出他自己的悲惨经历。另一个普通人衷心祝他晚年幸福、安康。
- ❖ 请代向老人家转达我的问候！老人家值得人们尊敬。■



(安度晚年的王丕忠在北京香山植物园)

## 【文摘】

编者按：

此文是钱理群先生为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撰写的长文《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读〈一百个人的十年〉、〈那个年代中的我们〉，〈我们的忏悔〉、〈1966：我们那一带的回忆〉》的第二部分，虽然作者只传给了几个朋友，但仍在网上占了三十个网页。因本刊要求首发，不得不将第一部分割爱，以文摘的形式刊发它的第二部分。钱文的原标题是：《反思与反省：这是为什么？》，现标题是编者改的。

## 关于文革的反思与反省

### ——教育·体制·人性·国民性

钱理群

文革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痛苦又难堪的记忆。在痛定思痛时，人们开始反思与自省。特别是最近几年，提出了“我们忏悔”的命题，认为这是经历文革这一代人的“政治责任”、“文化责任”和“历史责任”。<sup>2</sup>这是一个严峻的追问：文革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在文革狂信与杀戮的背后深藏着怎样的“中国问题”？我们每一个文革参与者的责任在哪里？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课题，我们今天的反思与反省仅是一个开始。根据现有的认识，我们将讨论四个问题。

### 教育问题

<sup>1</sup>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下）（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我们忏悔》（王克明、宋小明主编，中信出版社，2004年出版），《1966：我们那一带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

<sup>2</sup> 《前言》，《我们忏悔》，第7页。

前文已经说到，红卫兵这一代是“狼奶喂养的一代”。那么，这是怎样的“狼奶”？是如何“喂养”的？喂养的结果如何？这就必须谈到文革前的教育问题。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文革前，主要是1963——1966年间，在青少年中开展了五个方面的教育运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学习雷锋运动，培养接班人的教育运动，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争文件“九评”的教育运动，以及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教育运动。这五大教育对这一代人的影响至深，至远，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这些革命教育的中心是树立“革命第一”的观念，“把革命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高于物质享受，高于文化、科学、艺术，高于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sup>1</sup>为了“革命”，一切都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权利，以致生命；一切都可以越过、抛弃与不顾：人性、人情的底线，基本人伦关系；一切都可以毁坏：科学、文化、艺术、历史文物；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如一位历史的当事人所说，“‘神圣’地‘为了——’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高尚’，运动中的一切都具有天然不可置疑的道德正义性，包括视人视己如草芥的道德正义性”。<sup>2</sup>很多人都说红卫兵这一代人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自己至今也还在坚持这一点，这似乎也有相当的道理。但是，却很少有人追问：这是怎样的“革命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确实有“超出一己的私利”的献身精神，因而显得高尚而神圣；但它却是以“革命至上”的观念为指归，就如论者所说，“这种理想主义并未带来人民的福祉，科学艺术的创新，而是导致破坏与毁灭”。<sup>3</sup>这样的“革命至上理想主义”是直通文革的。

当然，关键还在这背后的“革命观”。这一代人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接受了毛泽东的革命观，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在文革前及文革时期，有三条毛泽东语录最为盛行，人人皆会背诵，可谓“深入人心”。

第一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

<sup>1</sup>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的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2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sup>2</sup> 吴琰：《病理切片一二三》，《我们忏悔》第377页。

<sup>3</sup>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的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25页。

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把革命暴力化了。而且毛泽东更提倡群众暴力，造反者无法无天的“痞子运动”：就是要“乱来”，“独裁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将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sup>1</sup>这样的暴力革命观不仅成为文革大杀戮的理论根据，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人的精神气质，暴力崇拜之外，更有一种以粗鄙为荣、蛮横自负的“痞子气”。在文革中“痞子”成为“革命先锋”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篇回忆文章就谈到其所在单位的一个女杂役成了革委会副主任，“那凶残，那野蛮，真是把中国的‘贫下中农痞子’演示得十分充分”。<sup>2</sup>在文革中后期的武斗中更有流氓帮伙的参与。所谓“文化大革命”，“革命”就是暴力革命，“文化”则带有浓重的痞子、流氓文化的色彩。<sup>3</sup>这都在文革全民杀戮中有鲜明的表现。

作为文革前的教育重点，文革指导思想的毛泽东革命观的第二个方面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sup>4</sup>《毛选》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的这段语录，深入人心。由此形成的是“分清敌我”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关系；一切矛盾、分歧、不同意见，不同利益与要求，都被视为敌我问题，必须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这同时也是一种“非敌即友，非革命即反革命，非红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敌对思维”，更要培养“仇恨至上”的“敌对感情”。这正是学雷锋运动的重心所在。“雷锋精神”的核心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与感情”。人人耳熟能详的雷锋语录就是：“对待同志要春风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一位红卫兵后来回忆说，雷锋的这些话，“是渗透我的灵魂中的”，文革中他就是像雷锋那样，响应共产党的革命号召，把鞭子“残酷无情”地抽向党指向的“敌人”的。<sup>5</sup>

<sup>1</sup>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7页，第16页，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sup>2</sup> 毛志成：《半生‘牛蛇’史，一世恩仇录》，《那个年代的我们》（上），第37页。

<sup>3</sup> 参看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1966：我们那一代的记忆》，第11—12页。

<sup>4</sup>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毛泽东选集》，第3页。

<sup>5</sup> 张雁冰：《我在文革中的那些事》，《我们忏悔》，第99页。

深入人心的，还有毛泽东的另一个革命号召：“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与坏人。我们善于辨别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人们”，要警惕“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sup>1</sup>提高革命警惕性也是文革前的革命教育的重心，由此形成的是论者所说的“阶级斗争迷信”即“把任何情况都当成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更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一切问题的思维模式”以及“阶级斗争的想象力”，到处寻找与发现“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坏人”，“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sup>2</sup>文革前的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以及文革本身，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寻找与制造隐藏的阶级敌人，凭借想象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群众政治实践。一位当年景山学校的学生，在参加了据说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电影”《早春二月》的批判，接受了阶级斗争教育以后，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太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来，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腐蚀我们。我过去崇拜的老师竟然受资产阶级影响给我们全面传授这么多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进行！”<sup>3</sup>在这样的引导下，许多学生都把自己想象成身处阶级斗争第一线的战士，当文革发生时，党和毛主席宣布，他们崇拜的老师和校长，都是“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这些学生“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把鞭子抽向老师与校长，就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了。

学习雷锋运动的另一个重点，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好战士”。文革前就开始流行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这样唱的：“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样就把革命崇拜与领袖崇拜统一了起来，革命至上最后落实为领袖个人意志至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由此造成的是一种盲从与驯服的人格。这样的“忠诚”与前面已有讨论的“反叛，仇恨”的结合，就构成了红卫兵，

<sup>1</sup>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1页，第154页。

<sup>2</sup>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40页，第41页。

<sup>3</sup> 转引自吴琰：《病理切片一二三》，《我们忏悔》，第372页。

特别是老红卫兵的基本精神素质，也是红卫兵暴行的内在精神元素。<sup>1</sup>

对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影响深远的，还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教育。1964年6月毛泽东作了《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讲话，由此而开始了接班人教育。据说这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sup>2</sup>其实质与要害是一个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第一代打下的红色江山是否能够千秋万代传下去的问题。这就为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提出了一个“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政治目标。研究者指出，其直接后果有三个方面。

“第一，大大地把学生导向政治，大多数学生原先以当科学家为目标，现在，他们转而认为当接班人是最光荣的事”。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与前途，成为这一代人最重要的精神特质，甚至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同时唤起的是对国家、民族、党的事业的历史责任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青年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因此成为许多青年学生的座右铭。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更自觉地以从事政治活动，成为政治家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这些人后来都理所当然地成了文革的骨干。第二，“加强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倾向。因为不管使用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辞藻，‘接班人’这个概念和封建时代的权力继承毕竟有相通之处，即‘父权子承’”。事实上，对接班人问题反应最为强烈的也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即红二代。血统论就是他们天然接班的理论依据。本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党就在学校里提出了“阶级路线”的问题，1964年提出接班人问题，阶级路线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与迫切，学生也因为家庭出身不同而发生了急剧分化。后来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骨干，绝不是偶然的。在文革初期发生的血统论论争，由此引发的相互残杀，都预伏在这一时期围

<sup>1</sup> 陈凯歌：《我是群氓中的一分子》，《忏悔还是不忏悔》，第262页。

<sup>2</sup>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绕接班人问题发生的思想动荡之中。“第三，引发或加强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和竞争倾向”。<sup>1</sup>这或许是许多人参与文革的潜在的动因，也是文革残杀的内在根源：我们已经说过，文革从根本上说，是一次权力再争夺、再分配。开始或许并不自觉，随着陷入愈深就愈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追求与努力。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苏论战推向高潮，时称“九评”，其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是当时政治生活的第一等大事，前一天晚上预告第二天有重要文章发表，大家就在早上七点半守在收音机旁，或在公共场合的大喇叭下，听中央电台当时家喻户晓的播音员夏青和齐越，用他们特别有磁性的男中音朗读评论文章；他们读得深情并茂，听众也完全被文章的逻辑力量和语言魅力所征服。这样的影响也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使这一代人的政治关怀由国内扩展到世界。其意义也有两个方面。它首先是被党的意识形态所控制，陷入“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中国去拯救”的主观想象之中，是典型的做不完的“中国梦”。有些红卫兵就是带着“解放全人类”的幻想投入文革的，有的还献出了生命。另一方面，其潜在的命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要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对这一代思想与思维的影响也有积极的意义。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探讨“中国向何处去”时，同时提出的就是“世界向何处去”的命题。其二，由此引发的，是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浓厚的理论兴趣。特别是在最初的革命狂潮过去以后，他们“力图在官方宣传机器之外，独立地阐述自己对于文革的理解”。<sup>2</sup>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思考，从“九评”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问题开始，但得出了与“九评”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结论，形成了文革民间思想。其三，对这一代人影响更大的，是“九评”所显示与代表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我曾经把这样的“九评”文体特点概括为“以真理、人民的代表自居”、“高屋建瓴，

<sup>1</sup>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的精神素质及演变》，第31页。

<sup>2</sup>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的精神素质及演变》，第110页。

以势取胜”、“华丽语言”与“调侃”、“流氓腔”的结合。<sup>1</sup>红卫兵与造反派都竞相模仿这样的对读者、听众极具情感的煽动力与心理控制力的语言，形成了文革“大批判风”。

以上分析表明，经过文革前的五大教育运动，已经在中国青少年中，培育出了一整套以“主义至上”、“革命至上”为中心的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能力。当年的参与者在反省中，将其概括为“卡里斯玛人格崇拜”、“敌对思维”、“暴力崇拜”、反启蒙（人道、人性）的“仇恨情感”、“非此即彼的极端逻辑”、“二元思维”，以及“英雄话语”、“宏大话语的叙事习惯”。这同时也是能力的培养，“仇恨的能力、极端思维的能力、把任何小事泛化到政治意识形态上来的能力，‘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批判能力，等等。这些浸满了“狼奶”的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能力教育与培养，都是在为文革作准备，在文革前“只是酵母”，“在文革中能量的爆发则膨胀得无边无涯”，最后形成了“文革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和能力”，造成一代人、几代人，以致国家“精神疾病”，前文所描述的文革全民狂热与残暴，就是这样的精神病状的反映，是狼汁喂养的结果。而当年向孩子喂狼奶的老师、家长，到文革中就被喂大的狼孩活生生的吃了：这是最大的历史嘲讽与悲剧。反思、反省者最后说，这都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自己和民族曾经有过的“心的选择，何违之有？”而“真正的枷锁在自己内心”。几十年过去了，文革当年遗留的心的毒瘤我们真的割舍了吗？<sup>2</sup>

## 体制问题

文革的悲剧、惨剧，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高度极权国家体制下，才可能发生。在文革造神运动和全民杀戮背后，都有看得见、看不见的党和国家不受监督与限制的权力之手的操纵。本文一开始就说，文革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结合的产物，其中“领袖主导，全党响应”就是体制的作用，而且是占支配性地

<sup>1</sup>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第407页。

<sup>2</sup> 吴琰：《病理切片一二三》，《我们忏悔》，第371页，第373页，第375页，第377页。

位的。而前文讨论的“教育问题”，也是国家行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革中的大屠戮，也主要是“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如研究者所说，“‘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个结果和延伸”。<sup>1</sup>文革一开始，公安部长就下令，公安部门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违法行为，“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抄家“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也就是说，造反中出现的暴力行为，都是在国家保护、鼓励，甚至唆使下发生的。1966年北京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1967年的“二月大镇压”、“七月大镇压”，1968年“夏季大镇压”，“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等等，无一不是对群众的镇压和屠杀，都是国家机器、军队和政府的行为。如果把文革中的屠杀与死亡完全归之于红卫兵、造反派的“暴民”行为，就会对国家体制的罪责，形成有意无意的遮蔽与开脱。因此，我们对“全民杀戮”的反思、反省，以致忏悔，都应该是有限度的。如果将其推到极端，变成“人人都是罪人”，就有可能让应对文革罪恶负责的“真正魁首”逃脱正义的审判。特别是文革的真相并没有彻底揭开，应该对这段历史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事实都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坚持“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sup>2</sup>我们的批判锋芒应该首先指向极权体制：每一个文革参与者自然有自己的责任，但这样的参与是极权体制引导与强迫所致，我们对自己责任的清理，也是在更深层面上揭示体制的罪恶。<sup>3</sup>

本文一开始，还谈到文革中“媒体起到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涉及文革时期极权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值得一说。中国的极权体制，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是有不同特点的。文革的特点就是领袖独裁与群众专政的结合。特别是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打破既定秩序，不惜将各级党组织扫荡以尽，以越过专制体系的中间环节，直接发动群众，对

<sup>1</sup>宋永毅：《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收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第16—17页，19-20页，24—15页，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年出版。

<sup>2</sup>秦晖：《特别前言》，《我们忏悔》，第33页。

<sup>3</sup>参看钱理群：《特别前言》，《我们忏悔》，第20—21页。

他认定的革命对象（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以及社会上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实行专政。而毛泽东和群众之间，又是靠媒体来连接的。毛泽东每有重要的战略部署和号召，都首先发表在媒体上，即当时所说的“两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上。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会有这样的记忆：报刊上一发表最新的“最高指示”，各派群众立刻上街游行欢呼，表示“拥护”，并立即变成行动。这样的“登高一呼，一呼百应”是最能显示文革专政的特点的。以“两报一刊”为代表的媒体，就不仅是传达信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者的作用。各地方的记者站还担负了收集情报，上通下达的重任，成了有力的专政工具。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革中的党报就是代表党，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回忆说：“我与当时的人们一样特别相信报纸和书，认为凡被铅字印在纸上的就一定是对的”。<sup>1</sup>而另一位知青则反省说，他在文革中就是“顺着报刊的指引”，一路打打杀杀，今天指向这一拨敌人，明天又转向另一拨“与老敌人相反的新敌人”。<sup>2</sup>文革期间，媒体在党和国家极权体系里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题目。

有研究者对这样的极权体系所建立的具体制度，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谈到了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其一，“制造一个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阶级敌人’队伍，和以他们的子女为成员的‘不可信任者’队伍，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一个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种姓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同，统治者不断在统治集团内部和一般群众之中清洗出一些人落入贱民队伍，又在贱民中树立一两个‘弃暗投明’、‘脱胎换骨’，为官方所器重的典型，使所有贱民怀着上升的希望。这种做法极为聪明与有效，它使大多数人谨小慎微、驯顺服从，生怕‘犯政治错误’而贻误终生前途。同时又使被压制者一心企求救赎而不至反抗”。其二，“制造出一个以政治监视为职业的政工队伍和一批平时专打小报告，政治运动一来就兴风作浪、罗织罪名、落井下石的政治打手”，这两部分人就构

<sup>1</sup> 张雁冰：《我在文革中的那些事》，《我们忏悔》，第101页。

<sup>2</sup> 刘齐：《见血及其他》，《我们忏悔》，第355页。

成了所谓“积极分子（左派）队伍”，成为体制的依靠力量。“在这种制度下，告密不仅不是可耻的事，反而成了一种美德，成了‘争取进步’的必要条件。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的关键是看其是否‘靠拢组织’，这指的是勤于汇报自己及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学校班级，工厂车间，军营连队）都把群众分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一头（左派）是驯服工具，也是政治打手；一头（右派）是遭受迫害的“阶级敌人”；一般群众（中间派）就战战兢兢生活在政治夹缝里。三派都处于党的绝对控制中。其三，“控制人的最基本的手段是档案制度。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从中学时代起就有一个档案。里面详细记载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政治表现，以及政治运动中的结论。还有别人的告密材料。人们永远不知道档案里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它像一个阴影终生追随你，又像达摩克利剑悬在你头上，当你和领导发生矛盾要挨整时，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决定你要成为靶子时，档案中的材料就被抛出来，成为置你于死地的利器”。<sup>1</sup>——以上具体制度是落实到基层的，而且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因此，在文革初期就成为人们造反的直接对象，烧档案，揭发告密者，冲击以家庭出身决定人的命运的“阶级路线”，都被认为是一种“革命行动”。也同时引发了各单位内部的激烈斗争，前文谈到的各派之间相互残杀的“内战”都与不同人群对这些制度的不同态度（背后又有不同利益需求）直接相关。而在文革中、后期恢复与重建秩序时，这些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制度，又以新的形式建立起来，至今也还在发挥作用。

## 人性问题

《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的作者冯骥才在广泛收集、记录了文革中普通人的经历，以及让他战栗的“灵魂的虐杀”，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时，有一个分析：“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忌、怯弱、自私、

<sup>1</sup>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152——153页。

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起来，成为可怕的动力”。<sup>1</sup>在他看来，“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是中国人的最大悲哀”。<sup>2</sup>——这是一个深刻、重要的概括。

前文引述过的《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一个看客——》一文的作者，谈到当朋友被揪斗，“我当时是想要向前，却犹豫而止步”，原因在“我害怕”：我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关在牛棚里，“我一心努力想挤进那个‘革命队伍’中，摆脱作为一个‘异己’的恐惧，只有在革命队伍这个群体中，你才不会孤立，你才可以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中成为主体一员，你的恐惧才能消散。比如说，你鞭打别人你就不恐惧，而你若无权鞭打，你就随时有被打的惶恐”。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只有参与或容忍打人，才能免除被打的恐惧”的无情事实与逻辑，而“恐惧是超乎一切的，强大的。在恐惧面前，理性思考、正义、人格、亲情友爱——都可能迟疑、止步。就如犹太集中营里看着别人受死无动于衷甚甘为帮手是一样的生存恐惧下的自保”。这“生存恐惧下的自保”应该是人的本能与本性，现在却被无情地利用来威逼人们服从强暴，并参与其中，成为帮手。“我们曾经以为有些东西是高于生命的，而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被我们背叛了”，“其深层和基本原因只能是恐惧——人类共有的与生俱来的恐惧。因为恐惧，不惜跻身刽子手的行列！”<sup>3</sup>可以说，整个文革狂热、狂暴，以致整个国家的强权统治都是建立在人们的恐惧上的。如一位忏悔者所说，是“思想层面的盲从迷信和心理层面的恐惧害怕相辅相成，汇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裹挟了亿万民众，也包括几乎所有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完成了文革的造神与杀戮。<sup>4</sup>

另一位知青在自省时则说：“趋利避害是我的天性”，<sup>5</sup>这大概也是人的本能与本性。

“避害”当然是出于恐惧，而“趋利”大概是出于私心。尽管文革大批“私字一闪亮”，其实许多人参与文革，都有自己的个人目的，即利益的驱动。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在谈到自

<sup>1</sup> 冯骥才：《前记》，《一百个人的十年》，第1页，第3页。

<sup>2</sup> 冯骥才：《终结文革》，《一百个人的十年》，第7页。

<sup>3</sup> 丁珊：《我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看客——》，《我们忏悔》，第340页。

<sup>4</sup> 卢晓蓉：《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我们忏悔》，第258页。

<sup>5</sup> 张华：《趋利避害是我的天性，斗争观念深入我心》，《我们忏悔》，第273页。

己“告发”同学的动因，其实只有一句话：“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sup>1</sup>而另一位知青则说：“那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是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sup>2</sup>还有一位反省者更是坦言，自己违心参与批斗，是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在那个时代，批斗会上“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立场错了，就会关系到能否入党、入团这样的“政治前途”，更会影响毕业分配、工作安排等等实际的利益。<sup>3</sup>如论者所说，极权统治的力量正是在于它对政治、经济、物质资源的全面垄断，对人们的生存资源的控制。也就是说，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是与人们的基本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服从，就一切（政治，经济，物质）都有“前途”；不服从，就一切都没有，就会失去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以致生命。<sup>4</sup>在文革中，就是利用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与本性，把对政治、经济、物质资源的垄断、控制作用发挥到极致：一方面，用对不驯服者的生存资源的剥夺，来震慑人心；另一面，又用政治、经济利益的诱惑，引发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以此收买人心，达到对人的严密控制。同时，又将这样的欲望，用“革命”的神圣光彩包裹起来，即用革命的名义来谋取私利，满足欲望。而如一位知青在忏悔中所说，“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指定敌人；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对人施暴”。<sup>5</sup>可以说，正是这样的“革命名义”下的人的欲望（政治、经济的实际利益，甚至性欲，其核心是权力欲望）不加节制的无限膨胀，导致了文革惨无人道的种种暴行。

我曾经说过，人的本性是有善有恶的，健全的社会总能够扬善抑恶，而社会一旦出了问题，就会扬恶抑善。文革正是这样一个扬恶抑善的时代；而文革所张扬的是人的兽性（嗜杀性），所压抑的是人的神性（敬畏生命）。一位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反思“女学生打死女校长”事件时说：“在那一刻，她们不仅失去了女性的温存善良，也失去了起码的人

<sup>1</sup> 老鬼：《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我们忏悔》，第345页。

<sup>2</sup> 李斌：《一个“狗崽子”的迷惘》，《我们忏悔》，第238页。

<sup>3</sup> 赵遐秋：《跟风整人的懊悔》，《我们忏悔》，第49页。

<sup>4</sup> 陶东风：《盲从与利益考量——读〈我们忏悔〉》，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0期。

<sup>5</sup> 王克明：《我打谷志有》，《我们忏悔》，第181页。

性”。这是为什么？“如今我们都已经人到中年，做了人妻人母。我们用成熟的眼光审视自己，看见了我们人性中那些丑陋的东西——私欲和野心，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这是我们生命的毒素”。<sup>1</sup>当时只有14岁的一位山东的高一学生也反省说：“恶作剧本是顽童的特征，但欺负不能还手的弱者，体现的是人性之恶”，他在文革中就是对那些被批斗者任性“捉弄”而“乐不可支”，被激发出的是心灵冷酷的一面。<sup>2</sup>另一位反省者则说：“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而自己这一代，“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着”。<sup>3</sup>这里揭示的，是文革青少年施暴的重要原因：这是“原始本性”与“洗脑教育”双重作用的结果。而“洗脑教育”的实质，就是将青少年的原始本性中的愚蠢与残暴，引向阶级斗争的轨道，利用孩子之手，残害自己认定的“敌人”，那些被横加“和党争夺下一代”罪名的校长和老师。这本身就是残酷和卑劣的。

人们还注意到，文革中的暴行大都是集体的，如一位红卫兵所说，这是“群体之恶”：“在群体的名义下做坏事，士兵能滥杀无辜，工人能够盗卖产品，农民能够哄抢山林，学生能够打骂老师——。因为是群体行为，大家都干了，个体在群体中扮演的只是追随者的角色，谁也不用负具体的责任。所以，在个人的心灵上也很少留下愧疚、痛苦的负面的痕迹”，事情过去，“群体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尽快地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记’了”。<sup>4</sup>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对人性善的方面的利用。《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有两篇是老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的自述，他们都强调“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有足够的正义性，“我们当时不是怀着卑鄙的目的参加的，当时正经八百当革命来对待的”，“以一种虔诚的心，跟着领袖去”打一场“圣战”，自有一种神圣感。年轻一代更把自己全部青春的激情，对未来的美好想象，都投入其中。但最终却发现落入了“不停止的翻来覆去，

<sup>1</sup> 冯敬兰：《记忆的疮疤》，《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第475页。

<sup>2</sup> 刘伯勤：《我的文革经历》，《我们忏悔》第127页。

<sup>3</sup> 高宜：《最黑暗的夜晚》，《我们忏悔》，第54页。

<sup>4</sup> 胡健：《艰难忏悔》，《我们忏悔》，第140—141页。

你上我下，你死我活”的“权力战”中，而且退不下来。这就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突然发现整个文革就是个阴谋，一个个具体的“小阴谋”外，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但“又不肯信：如果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真的成了牺牲品？”<sup>1</sup>这正是论者所说的，“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sup>2</sup>于是，就有了无比沉重的总结：“我们曾以童贞般的信念，赴艰蹈苦。追求过英雄主义的无英雄、生命价值的无价值、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真理。”<sup>3</sup>

## 国民性问题

冯骥才先生对文革还有一个总结：“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sup>4</sup>痛定思痛，就不能不引发民族的自我反省，尤其是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反思。

首先提到的是：“文革闹剧并非如导演所言‘首创’，不过只是重演和强化了历史上有过的闹剧。王莽、宇文邕、武则天、洪秀全们，都曾自导自演过内容与形式极其相似的闹剧。迷信、告密、效忠、内讧、动乱、盲从，似与文革同台演出。甚至连宇文邕（北周皇帝）公开强迫和尚与尼姑性交的荒唐，都堪与文革中有过的勒令和和尚与尼姑结婚媲美”，“历史闹剧自上而下，文革闹剧自下而上；无不由农民的非理性理想主义作基础”。<sup>5</sup>前文提到的“文革进行了两千年”的命题，<sup>6</sup>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谈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人的“奴性”，并且有这样的阐述：“自秦汉始，我们民族驯服于残酷的封建专制政体两千余年。究其实质，这个封建专制政体，竟是从未脱离过奴隶制的封建专制政体。于是，奴化历史，奴隶风俗，奴性教育，奴科学派深入普及，时代相传，演成了根性。于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做人的时代，只有‘做稳奴隶’的时代和‘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叩头、请安、匍匐、唱诺、悬

<sup>1</sup>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59，247，364，379页。

<sup>2</sup> 冯骥才：为《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写的“点评”。《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60页。

<sup>3</sup> 岳建一：《重铸民族灵魂》，《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第845页。

<sup>4</sup> 冯骥才：《前记》，《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页。

<sup>5</sup> 岳建一：《重铸民族灵魂》，《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第847页。

<sup>6</sup>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15页。

恩——竟然数千年行之大廷，视同典礼，奉成金科玉律。种种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愚忠行径，也一代代尊为万民效仿的高风亮节。满朝皆是奴颜婢膝之官吏，举国尽为因袭苟安之顺民。在官场，必言：‘大人栽培’；在民间，常曰：‘小的不敢’。强权者一声令下，无不卑躬折骨以赴之。此乃国风千古”。<sup>1</sup>这样的千古国风，文革中更吹遍华夏，但都打着革命的旗号：“叩头、请安”变成“早请示，晚汇报”；“奴颜婢膝的官吏”被称作“紧跟党和毛主席的革命好干部”，“因袭苟安之顺民”被誉为“无限忠于党和毛主席的革命战士”；“大人栽培”变成“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培养”，“小的不敢”变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愚忠行径”一律视为“革命觉悟高”的表现，等等。重要的是，由此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永远做驯服工具，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就永远“安全”、“稳定”，坐稳了奴隶，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sup>2</sup>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心向往之的“太平盛世”。现在，它经过革命的包装，成为文革所要建立的革命新秩序的实际内容，以后又经过“现代化”包装，成为现代“中国梦”，或曰：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不管如何包装，建立“奴化中国”以实现统治的稳定的实质是不变的，文革就是建立这样的“奴化”秩序的重要阶段，其内在逻辑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中国从无宗教立国，而是以人代神”，<sup>3</sup>这大概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国民性形成的重要背景。因此，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新宗教”，是落实到人身上，成为“个人崇拜”。中国的奴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人（从本单位的领导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依附。文革中的个人独裁实际上是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帝王的，因为在儒家传统里，皇帝之上还有“道”，所有的“忠臣”首先是忠于“道”，因此“忠臣进谏”的事屡有发生，皇帝也必须“纳谏”。但在中国的现代极权体制，是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政治权威统治、精神权威统治与道德权威统治于一身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社会、思想体系，在文革中

<sup>1</sup> 岳建一：《重塑民族灵魂》，《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第 848 页。

<sup>2</sup> 沙叶新：《“检讨”文化》，《忏悔还是不忏悔》，第 62 页。

<sup>3</sup> 岳建一：《重塑民族灵魂》，《那个时代中的我们》（下），第 847 页。

更是发展到了极端。因此，在文革期间，人人都要写检讨、认罪书，而毛泽东是从不像历代帝王那样写“罪己诏”的。<sup>1</sup>这样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是要求“奴性入心”的，不仅在政治上绝对顺从，而且要在思想、精神上，发自内心的驯服。这或许是更令人恐惧的。

不仅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仰。鲁迅说，“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既不“信”，也不“从”，而只是“怕”和“利用”，“只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都那么做”。因此，鲁迅把中国人（特别是“上等中国人”）称为“作戏的虚无党”。<sup>2</sup>鲁迅这里所说，都点到了中国国民性的要害：其一，中国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有“怕”和“利用”。以此看文革时的毛泽东崇拜，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绝对“信从”，而且十分“虔诚”；但就如前文所分析，实际是出于“畏惧”，更是一面造神，一面把神当招牌，利用神。中国文化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实用主义，还有鲁迅这里说的虚无主义。毛泽东的文革“新宗教运动”最后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中国国民，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在文革中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证实了鲁迅的判断：“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sup>3</sup>对照文革期间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表现，能不感到羞愧吗？

其二，中国人最善于做戏。文革的种种效忠活动，包括前文所描述的学语录，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开始或许还有点真诚，是一种“愚忠”；到后来，就越里越成为一种做戏了。这样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就造成了许多中国人的表里不一，口是心非、伪善等人格缺陷，以及谁也不相信谁，缺乏基本信任，不惜以恶推测人的人际关系恶化。这在文革中是得到恶性发展的，文革本身就是一场大游戏，大骗局。

<sup>1</sup> 参看沙叶新：《“检讨”文化》，《忏悔还是不忏悔》，第65—67页。

<sup>2</sup> 鲁迅：《马上支日记》，《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第3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sup>3</sup> 鲁迅：《这个与那个》，《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152—153页。

鲁迅还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sup>1</sup>，中国的汉字可以说是世界最具有灵活性的文字，同一件事情，换一种说法，就完全是另一个意思。比如说，“滥杀无辜”说成是“镇压反革命”；“告密”说成是“向组织汇报”；“揭发父母”说成是“划清界限”，就都合理合法了。文革学习会上的发言，大批判文章，充斥着大话、空话、假话、套话，其实都是在玩文字游戏；而且讲者、写者、听者、看者，个个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演戏，但却要一本正经地演下去，说破了，就是破坏“游戏规则”，反而会成为“公敌”。最令人发指的，是用革命的言词掩盖杀戮的血腥，像鲁迅说的那样，“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sup>2</sup>

没有信仰，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人对精神问题的忽略，缺少“对彼岸世界的神圣向往”。如一位回忆者所说，尽管文革中像滥用革命的名义一样，我们也滥用神圣的名义，但我们真正崇拜的是“物化的神圣”。我们“从彼岸走向此岸”，热心于在此岸建立“天堂”，进行“人间净土化的努力”。文革的实践恰恰证明，此岸的天堂必定是地狱，正是人间净土化的努力，“伤害”了我们每一个人。<sup>3</sup>一个缺乏神圣感，没有敬畏之心的民族，必然是既不爱，也不怕的。这是文革的大屠戮中，人们并不困难地就越过了道德底线的重要原因。前文谈到的杀害老师，把母亲送上断头台这类伤天害理的事之所以发生，是和既不爱又不怕，没有任何精神、道德约束直接关联的。

彼岸关怀的缺失，使得中国这个民族特别地“现实”、“世俗”。这是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儒家是不谈鬼神的，它对非人间、非此岸世界的事情是回避的。它关注的，只是“如何在现世活着”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一种“活命哲学”是可以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影响至深。儒家在人际关系中强调谦和、礼让，和为贵，本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背后，又有一个对既定秩序的维护的意图。这样就形成了以“忍”为核心的国

<sup>1</sup> 鲁迅：《逃名》，《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都409页。

<sup>2</sup> 鲁迅：《病后杂谈》，《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175页。

<sup>3</sup> 蔡翔：《神圣回忆》，《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第262页。

民性格。一位文革的参与者说自己“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素质”，“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的东西”就是两个字：“忍和善”，“忍字是心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sup>1</sup>所谓“忍”，就是忍辱负重，妥协苟且，委曲求全，得过且过。这是一种生命的惰性。有人说中国人只要还能“活下去”，不管怎么个活法，再窝囊也要维持现状，绝不思变革，更不要说反抗。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善”，不过是“无用”的代名词。中国人就是这样，能够当顺民，就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一旦“想作奴隶而不得”，就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暴民。应该说，许多人就靠“忍”这样的内含奴性的生存智慧度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的。

文革中，表现更充分的，还有中国人的“好斗”，即前文所描述的“窝里斗”，也可以说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这是表现了中国国民性的另一面的：即论者说的“阴狠”：<sup>2</sup>暴戾、凶残、玩弄权术、阴谋，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显然有法家的影响。我们是可以用“忍”与“斗”来概括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中国国民性的两大特点的。而这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外儒内法”的张力结构。

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中国国民的“忍”与“斗”，是针对不同对象的。一般说来，都是对上、对强势“忍”，对下、对弱势“斗”。因此，鲁迅说，中国人即使受到“强者的蹂躏”，心中“蕴蓄怨愤”，也“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是最能反映人性的“卑怯”的。<sup>3</sup>鲁迅还指出，这样的“对上忍，对下狠”的国民性，又是决定于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的：“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sup>4</sup>中国国民在这样的等级结构里，是有双重身份的：对上，是“奴才”，卑躬屈膝；对下，是“主人”，耀武扬威。由此形成的是“主奴互换”的双重人格，这在文革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个受害者，既可以甘心为奴而获得暂时的平安，更可以在加害于他人中得到某

<sup>1</sup> 《说不清楚》，《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86页，第289页。

<sup>2</sup> 岳建一：《重铸民族灵魂》，《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第848页。

<sup>3</sup> 鲁迅：《杂忆》，《坟》，《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38页。

<sup>4</sup> 鲁迅：《灯下漫笔》，《坟》，《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27页。

种主人感（至少是自己还在“人民内部”的感觉），从而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和满足。而专制、极权统治也就这样长治久安了。

而且，还有国民性中的“健忘症”。这也是令反思、反省者最感痛心与无奈的：“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当然更有现当代的极权政治的严控——钱注），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一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sup>1</sup>

于是，就有了包括本文在内的“拒绝遗忘”的努力。

### 权作结尾：“文革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最后，还是抄录冯骥才先生的一段话，权作结尾——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作为政治的文革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那怕是对文革一无所知的年轻一代——钱注）。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道它缘自文革”。<sup>2</sup>■

2016年2月18日

<sup>1</sup> 冯骥才：《前记》，《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页。

<sup>2</sup> 冯骥才：《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忏悔还是不忏悔》，第292页。

## 【读者来信】

## 1. 杜文：读王复兴《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一文有感

我是北京四中65届高中毕业生。读了贵刊169期《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一文，有如下感想：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结束40周年，按理说这是个重要时间节点，应该予以隆重纪念，意在不忘历史，防止重踏旧辙。正在狐疑之际，幸阅《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一文，阅后感触颇多。作者王复兴乃我四中同班同窗，他站在一个真正史学家的高度，深入调查，以详实的史料和独到的分析，披露了当年那段风风雨雨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说明了文革之前有文革，说明了红卫兵运动的预演在四中，为我国文革史的研究增添了一部力作。

记得1964深秋，在学潮爆发后，在高三4班，我（时任班长）和李峻（时任团支书）被宣布靠边站，被“夺了权”。有人说我阶级立场有问题，“看你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意思是接触的尽是家庭有问题的人。我和毕向明同住一宿舍，社教开始后，在工作组领导下，毕向明被整，被定为敌我矛盾。不让他考大学而去农场劳改。我们明知是冤案，却无力相助，更无发言权。对于当年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来讲，那场运动可谓来势汹汹。我们面临高考，却要去投入阶级斗争。

高考发榜，我被第三志愿的河北医学院录取，认为自己可能没考好。但20年后才得知，因我有海外关系，重点院校不得录取。由此我才知道文革前高考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保密政策。难怪我在大学时还因这条而无端挨整。

好在这些都已成为往事，但我认为，过去的事是不该被遗忘的，不忘的本意并非为着“秋后算账”，追究同学的个人责任，那时大家还都是孩子，而是为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如古人所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本人之所以有感而发，是因为文革回潮之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时有寒风来袭。我们

都已步入古稀之年，且是最后一批文革亲历者，希望世人永记极左路线的危害，不希望文革重演。可幸的是，有王复兴这样一批有志于文革史的研究学者，努力将文革真相告知后人，相信文革惨剧不会重演。■

2016年10月13日

## 2. 沈爱华谈“宇清谈画”

我在电视上见过王宇清先生，他的收藏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只能用“远见”和“宏富”来形容。能在这些宣传品中看出价值是需要远见的，而他的藏品是如此之丰，也让我叹为观止。《记忆》上凡是有这个专栏的，我都要看好几遍。贵刊一共发了三期【宇清谈画】，《1949-1979年间不让画什么画》（《记忆》156期），《再见，画里童年》（《记忆》160期），《“大跃进”年代的“美术乌托邦”》（《记忆》169期）。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读者在看了画之后，最需要的是作者的评点分析。王先生的分析有的很精辟，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我感觉，他似乎越来越着重展示画，而懒得分析了。中国是宣传画的大国，它的理论源流、生产机制、文化传播、社会影响以及它与其它通俗艺术的关系都值得深入探讨。希望以后的“宇清谈画”更上一层楼，给读者以更多的教益和启发。■

沈爱华

## 3. 北京四中退休教师给王复兴先生的信

复兴：你好！

我是四中退休教师。看了你在《记忆》上关于四中社教的文章，觉得很好，很佩服你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写得很翔实。当年的当事人都已经步入老年，你能够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把事情真相抢救出来，功德无量。我给你补充一些四中社教的史料。有些可能是你不了解的。

毕向明在四中工作后，和我是同事。他自己去建工学院学了工民建，拿到了资格证书，他证明了当年学习的优秀，劳改了这么多年，死里逃生，居然还能拿到大学文凭，不简单。

四中社教，学生重点整了毕向明，教师整了王行国。毕向明被戴“反动学生”帽子，杜绝升学、就业之路；在教师里整了王行国（教导处的学生工作干部），连续批判后淘汰出教师队伍，流徙校办工厂。

原四中副书记、副校长燕纯义在一份材料中对王行国被整之事有如下记述：

王行国是学校首位学生团委副书记（书记是专职脱产干部）。1956年“提前毕业”，留校做团委书记。他1958年21岁时，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而后当时的市委领导派专人“帮助总结提高”交心稿子，原来的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思想被上纲为反党思想。就这样被扭曲的“交心”，便成了“罪证”，在后来一贯的政治气候条件下，成了王行国人生的枷锁和不断遭到惩罚的“原罪”。

1958年至1959年，他被发配到南郊农场劳动改造。

他回到四中后，做学生思想工作。1964年到1965年8月，在四中发生了一次四清运动。这在一般学校是没有的，四中因为高干子弟集中，上层的矛盾斗争反映到了这里。市里派下来一个强大的工作队“灭火”，领队的4个人是北京市教育口的顶尖人物——市委常委、教育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团市委书记汪家镠（后来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区委文教书记侯维成，40多个工作队员都是在全市新选拔的处级干部。

在运动后期，因为“立场没改造好”，王行国受到3次批判。1965年8月10日第3次批判会上，领队李晨和另外5名工作队员之多都参加了批判会进行批判。本来从未参加王行国所在组的学校书记刘铁岭被拉出来主持批判会。之后，王行国被从思想教育队伍中淘汰，流徙校办工厂劳动改造。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13年，在这里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直到文革以后才回到教师队伍。

以上资料引自燕纯义老师的文章，《记忆》曾刊发过。

在社教中批判王行国的起因，是因为他给领导尖锐地提意见。为此工作队副队长（后留任做校长）的杨滨，于1967年3月28日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作检查说：“在四清运动中，王行国老师因为对解才民等领导干部揭发较多，也比较尖锐，这本来是革命行动，就因为不

符合工作队的既定框框——“四中没烂，问题不严重”，就抓住他58年双反交心运动中自己暴露的某些右倾思想的小辫子，并说他乘机‘翻案’，于是给他扣上‘和党有对立情绪’的罪名，李晨还分析他有‘四中不烂不甘心，解才民不撤不死心’的劲头，就对王行国施加压力，进行小组围攻。”

四中党支部书记刘铁岭于1967年1月31日也写有书面材料，对此反省道：“在批判王行国的会上，我担任组长，主持进行了批判。当时确定王行国的问题是立场问题，与1958年的问题在思想上有联系。”四清工作队“对于那些积极给当权派提意见的、不尽然按照工作队意图行事的人，是不满的，而采取了抓辫子整人的办法。对王行国的批判就是属于这一性质。”“对错误地批判王行国，我是负有责任的。”

以上对四中社教，略作一些补充，供参考。 ■

2016、10、08

#### 4. 胡启明、陈小穆、郑道谈 168 期周向红专辑

作为文革受害者的家属，我很佩服周向红，在文革受害者中，她无疑是一位强者。手中有被整的黑材料的人其实是不少的。光我知道的，就有四五个。我爸的黑材料至今还在我大姐手里保存。十年前，我就主张给公布出来，印成书，送给国家图书馆，可是开了几次家庭会议，都有相反的意见。怕这怕那。

一是怕揭伤疤——从反右倾到文革，我爸一直挨整，整他最狠的两个人，一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是他最信任的生活秘书。

二是怕伤和气——黑材料里有我妈、我姑姑、我叔叔和他的战友的揭发材料，我姑还活着，虽然人在美国，要是万一知道了，气出个好歹来，我的侄子侄女都得找上门来。他的战友虽然不在人世了，但人家还有子孙，碰上一个叫真的，就很麻烦。

三是怕人家说闲话——有些人，文革的亲历者，包括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甚至包括文革历史的研究者，喜欢站在高坡上大发议论，横加指摘。比如，有的说你的材料没有价

值，你就是想吸引人家的眼球，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的说，你想用以前的苦难做文章，博取人家的同情。还有的说，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通过抬高你父亲，抬高你们自己……。就是被这些飞短流长，把我们的几次家庭会议都搅和了。

所以，我很佩服邵燕祥、杜高，对李慎之、郭小川的儿女也充满了敬意。人家比我们家更有勇气。168期周向红专辑让我受启发和鼓舞，我要用它来说服我们家的反对派，以周向红为榜样。直面惨痛的历史，扭曲的亲情，把文革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武汉 胡启明

看到168期《中央专案组·周向红专案》的标题，我感觉有哗众取宠之嫌。据我所知，“九一三”事件后10月3日，确实成立了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成立了不同级别的学习班，但从来没有立过个人专案，没有黄永胜专案，没有吴法宪专案，没有李作鹏专案，没有邱会作专案；也没有胡萍、王飞等涉案九一三事件的专案，怎么就冒出一个周向红专案？而且从周向红的材料看，她除了是周宇驰之女，与“九一三”事件毫无关系，而且从始至终都没有进过中央专案组的学习班。所以用这个标题是不合适的。另，周向红在材料中有一句，她最高只进过省学习班，没有进过中央学习班。

中央专案组十人，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没有周向红材料中提到的王洪文、郭玉峰。就是说，她转黄春光和鲁莹信，触怒了中央专案组。■

陈小穆

周向红专辑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相信研究文革社会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的人迟早都会认识到这一点。■

沪上 腊生

## 【本刊声明】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辑：穆而农

本期校对：续霜红

本期版式：步绛尘